

HUANGPU

黄埔

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为黄埔同学立言 为祖国统一尽力|

双月刊 总第226期
2026.

1

我的黄埔情缘

黄埔小史料 传承大精神

从湘军将领到黄埔军校代校长的方鼎英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 ——记抗大中的黄埔师生

中國抗日軍政大學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

特别策划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记抗大中的黄埔师生

6 抗大：革命熔炉 将帅摇篮 / 赵乾荣 李瑞芳

23 抗大中的黄埔师生 / 刘中璞

时政

两岸时评

42 赖清德正在将台湾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 彭韬

两岸纵横

44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5 年 10 月—11 月 / 吴亚明

在同学会工作的日子

48 我的黄埔情缘

——怀念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老人们 / 高燕茜

情系黄埔

53 黄埔小史料 传承大精神 / 吴坤坤

56 寻找黄埔三期生蒋作舟烈士的故事 / 蒋国雄

人物

人物春秋

58 从湘军将领到黄埔军校代校长的方鼎英 / 李在全

我的黄埔前辈

- 63 从淞沪会战到台湾光复——陈颐鼎将军往事回忆(上) / 陈万中
- 68 记外公安维俊二三事 / 白文宏

黄埔后代

- 70 “新北京人”刘元媛：以青春之姿，架两岸中医文化之桥 / 王丽
-

历史

口述历史

- 73 抗日战争昆仑关之役纪要 / 苏维中

黄埔收藏

- 79 漫谈黄埔炮兵教育 / 单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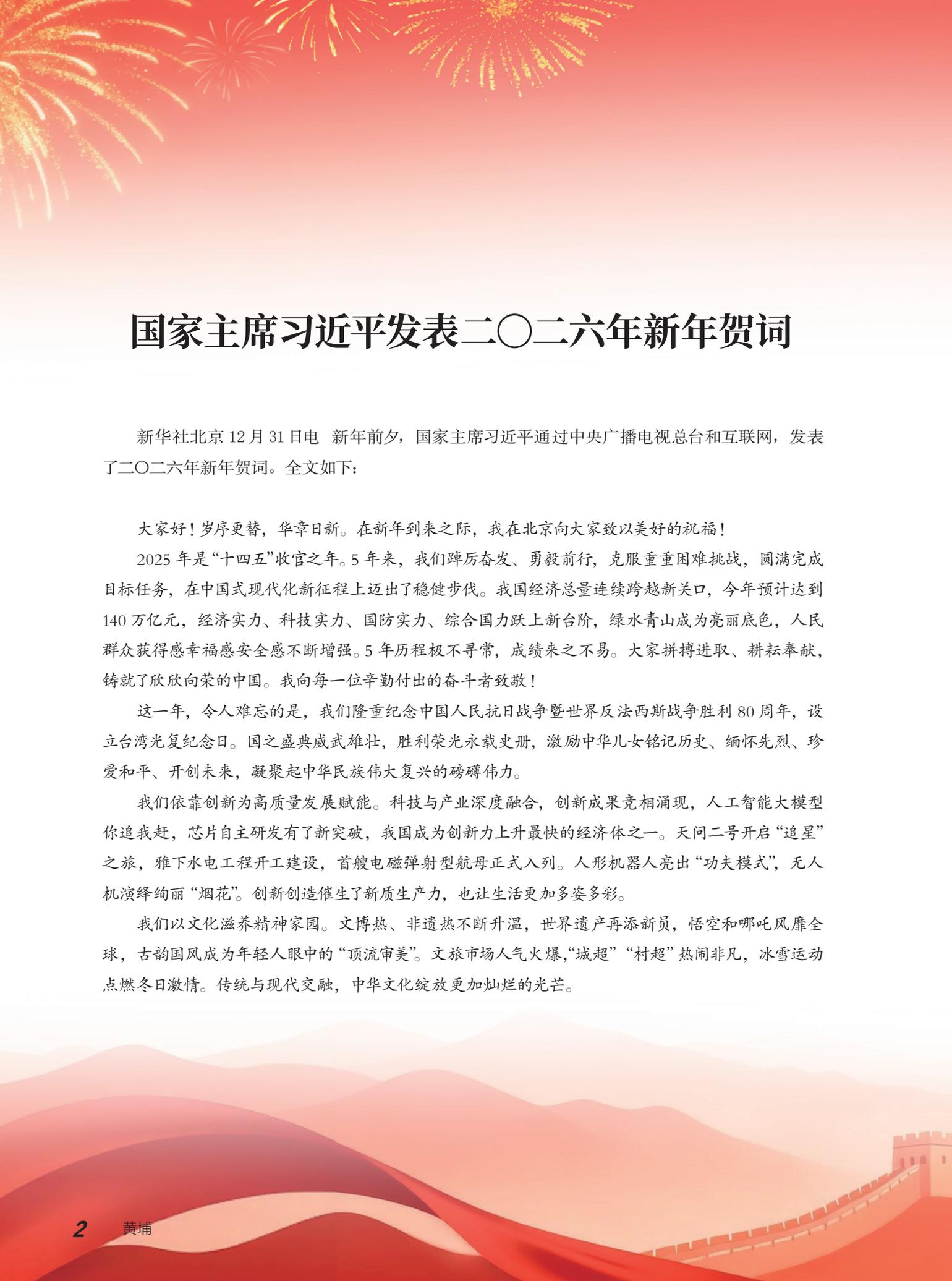
黄埔日历

- 89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举行沙基惨案纪念会 / 李岚
-

文化

黄埔连载

- 95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六) / 熊子杰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大家好！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在新年到来之际，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祝福！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5年来，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克服重重困难挑战，圆满完成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迈出了稳健步伐。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关口，今年预计达到140万亿元，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绿水青山成为亮丽底色，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5年历程极不寻常，成绩来之不易。大家拼搏进取、耕耘奉献，铸就了欣欣向荣的中国。我向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奋斗者致敬！

这一年，令人难忘的是，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国之盛典威武雄壮，胜利荣光永载史册，激励中华儿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我们依靠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下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员，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点燃冬日激情。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



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我到西藏、新疆出席庆祝活动，从雪域高原到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心手相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大家用洁白的哈达、热情的歌舞，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幸福的礼赞。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

我们继续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全球妇女峰会成功举办，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继“三大倡议”之后，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一些地区仍被战火笼罩。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不久，我出席了全运会开幕式，粤港澳三地同心同行，令人欣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党兴方能国强。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徙木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去腐生肌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新年的旭日即将升起。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神州沐朝晖！祝大家心有所悦、业有所成，万事皆可期！

（来源：新华网）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

——记抗大中的黄埔师生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并于1936年在陕北瓦窑堡创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大），次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抗大培养了20余万德才兼备的军政骨干。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全校师生奔赴华北敌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全国抗战史上的伟大创举，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抗大所锻造的为民族解放事业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同志曾以“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评价抗大。短短二十字，将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所学府紧密相连——1920年代诞生于珠江之畔的黄埔军校，抗战烽火中创立于黄河之滨的抗大，两校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环境，却血脉相通、精神相续。

黄埔军校乃国共合作之成果，以“创造革命军”为使命，开启中国近代革命军事教育之先河。十年后的抗大，则在民族危亡之际，成为锻造抗战骨干的“革命熔炉”。两校使命虽各有侧重，内核却一脉相承：皆为肩负时代重任而培育干部。翻开抗大史册，从决策者到教学骨干，处处可见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将宝贵的办学经验与革命精神，倾注于抗大的创建与发展之中。

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既为缅怀——透过岁月，领略伟人的历史远见与对革命事业的深切寄托；亦为激励——藉由过往，鼓舞后人继承先辈遗志，推动国家完全统一之伟业。



抗大：革命熔炉 将帅摇篮

□ 赵乾荣 李瑞芳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转变的历史关头创办，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它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培养了20余万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人才，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被誉为“革命熔炉、将星摇篮”。

抗大的创建和发展

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教导队——军官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的基层干部。1931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瑞金正式开学。第2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先后由萧劲光、刘伯承、叶剑英担任。1933年11月，以

红校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初步形成了初、中、高级教育培训体系。随后，红军大学改称为红色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随中共中央长征北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5月，党中央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

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百上千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前线上去。”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并讲话。毛泽东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



/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蓉市龙江书院首创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军官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基层干部。图为龙江书院旧址。



/ 1931年10月，红军正规院校的先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瑞金正式开学。图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



/ 1933年11月17日，以“红校”为基础招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初步形成了初、中、高级教育培训体系。图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



/ 1936年7月，“红大”移驻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保安地瘠人稀、极度贫困，只有荒山野岭、破庙烂窑，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红军干部全员动手，垒墙填坑，将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干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编草帘当作门窗，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改造出了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毛泽东曾风趣地对红大学员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场景）



/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门（1938年摄）。



/ 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



/ 1937年，孙维世（著名导演、演员）（中）与母亲任锐（原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左）同入抗大第3期学习。

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

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

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欧阳淞、曲青山主编，济南出版社2012年出版《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迁到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兼任，委员有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等。党中央对抗大的教学工作十分关心，如每周二、四上午，毛泽东都去抗大讲课，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多月，《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抗大是毛泽东一生领导军校工作中亲自担任领导职务时间最长、参加活动最多、付出心血最大的一所军事干部学校。除毛泽东以外，周恩来、王稼祥、朱德、贺龙等也经常到学校授课，为抗大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怀和重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抗大也随之成为抗日志士最向往的地方。为寻求革命真理，师生、夫妻、兄妹、母女结队成群地冲破重重封锁线，奔赴抗大学习。从抗大第2期



/ 抗大华侨学员合影（1938年8月）。

开始，前来投考的抗日志士不断增加，到第4期，共有学员5562人。此外，甚至还有朝鲜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他们在抗大这个大熔炉中迅速成长为坚强的抗日军政干部。

抗大当时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赞誉，在国际上也有重要影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两次参访抗大。1938年7月3日，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率雅德、雷克难和傅路德一行4人，到抗大参观访问，抗大教育委员会授予4位学联代表为“抗大名誉博士”学位。



/ 1940年5月底至6月初，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图为抗大学员和延安各界人士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



/ 1939年，毛泽东与访问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第二次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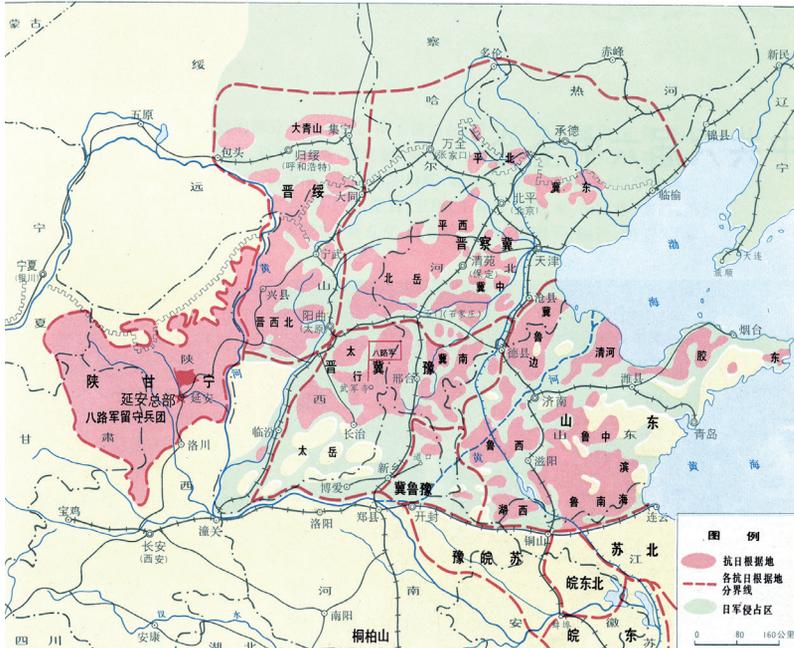
/ 1938年7月，抗大学员欢迎世界学联代表一行前来参观。

到敌人后方去！

至1940年，除了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包括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为吸收和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进一步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分别向晋察冀、晋东南根据地派去抗大第一、二分校师生。1939年6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迁到晋东南的决定》，把抗大总校迁往华北敌后根据地。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为抗大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7月10日，对外番号“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抗大师生踏上挺进华北敌后的征程，副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7月15日，纵队抵达黄河西岸，准备按预定计划东进时，获悉连日大雨滂沱引起山洪暴发，汾河水涨，不能徒涉。7月31日，奉中央军委电令，改变东进路线，先转入晋察冀军区。8月1日，纵队分成三个梯队从延川、延长一带出发折向北行。次日到清涧，经绥德、米脂、葭县（今为佳县），到达盘堂渡口，分批渡过黄河，抵达东岸的黑峪口。部队在曹家坡一带稍事休整后，在120师358旅和地方武装的护送下继续东进，翻越吕梁山，到达山西太原以北的庄磨、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略图
1940年



1937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到党员80余万人，军队近50万人。图为华北抗日根据地战略图（1940年）。



1939年，罗瑞卿（左四）率领抗大和华北联合大学5000余人开赴华北敌后。

豆罗一带。随后，纵队分三批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并于9月底到达河北灵寿县麒麟园、陈庄一带。

1940年2月，抗大总校又从陈庄一带出发，于13日夜穿越正太铁路封锁线，绕道山西和顺县境的皋落、青城、松烟经辽县（今左权县）的拐儿镇、芹泉、麻田一带，于2月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3月，与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第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4月15日，抗大在山西蟠龙举行第6期开学典礼。不久，罗瑞卿调离抗大总校，由滕代远接任副校长，何长工任教育长。

10月20日，日寇突然从黎城、武乡一带，纠集几千日伪军企图一举消灭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在这危急时刻，抗大总校奉命组织战斗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22日，由抗大第1团、第2团共五六百人组成阻击部队，在第2团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等指挥下，以伤亡20多人的代价，歼敌120余人，取得了横岭阻击战和“三十亩”战斗的胜利。此后，抗大总校分成东西两路，东路由教育长何长工率领，西路由训练部长王智涛率领，趁夜摸黑翻越辽县境内的摩天岭十八盘，甩掉“扫荡”的敌人，移驻河北邢台浆水镇。



/ 1939年8月，抗大总校师生在东征时穿越同蒲铁路日军封锁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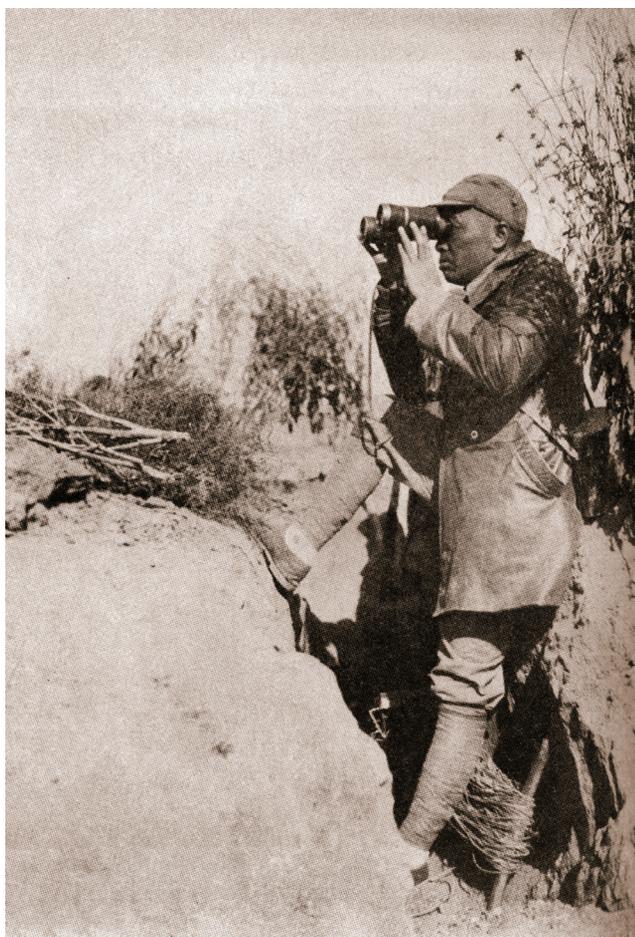
/ 1939年9月，八路军第120师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进行的陈庄战斗中成功挫败了日军破坏晋察冀边区后方的企图，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因战术成功和歼敌有效，被誉为“模范歼灭战”。抗大学员参与战斗。图为陈庄战斗示意图。



/ 1940年2月10日，抗大总校干部从灵寿县陈庄出发挺进晋东南时合影。



/ 1940年4月15日，抗大总校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第6期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出席并发表讲话。



/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 抗大派出部分同志直接参加战斗, 从中总结对敌作战的经验教训, 充实抗大的军事教材。图为彭德怀在指挥百团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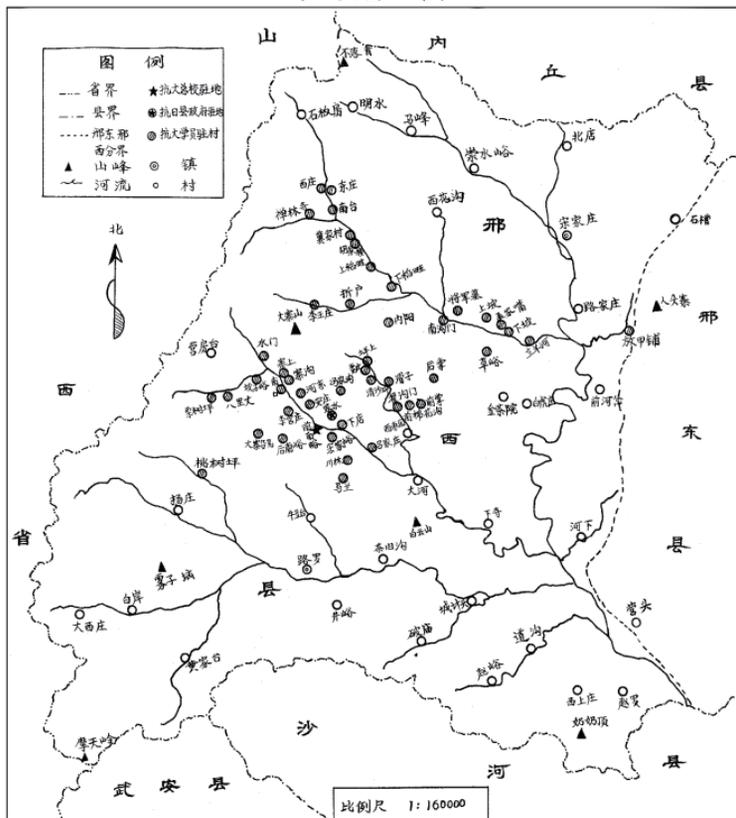
/ 1940年10月20日, 抗大总校在横岭一带激战10小时, 击退日伪军四次疯狂进攻, 取得横岭阻击战的胜利。图为抗大学员参加横岭阻击战。

抗大在浆水

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校5000余人移驻邢台浆水镇一带，当地群众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动腾房并屋、缴纳公粮，积极支援抗大办学。总校将校部设在前南峪，政治部设在浆水，卫生所设在安庄，供给处在河东。学员们分散驻扎在附近的各个村庄，可谓是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

加强正规化建设。抗大到达浆水镇，正值“百团大战”胜利之后，日、伪军在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还处在调整部署进行反扑的准备阶段，这时期的河北邢台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抗大领导特别强调学校的正规化建设，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建立各科正规化制度，要求各个部门围绕中心，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凡是教育计划规定的课程，都由校领导分工主持，先召集教员集体讨论，指定教员执笔写出初稿，再经教材编审组审查通过，并经校领导审阅批准，最后方可在教学中使用。其间共编印出版教材41种，发行18000多册，不仅满足了总校和各分校的需要，而且还提供给各部队使用。

抗大在浆水驻村分布图
(一九四一年)



/ 抗大在浆水镇驻村分布图。

这套教材被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

举办抗大5周年校庆活动。

1941年6月1日是抗大诞生5周年纪念日，为全面总结抗大5年来的办学经验，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办学成就，扩大抗大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促进抗大越抗越大，总校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校部驻地前南峪召开盛大的纪念大

会。

6月1日，抗大建校5周年纪念大会在总校校部驻地前南峪村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中央北方局、第120师、第129师、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党政机关、团体、学校、报社等70多个单位的来宾358人，驻在晋察冀边区的抗大二分校以及浆水镇周围各村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 抗大开办教员训练队，培训教员。图为教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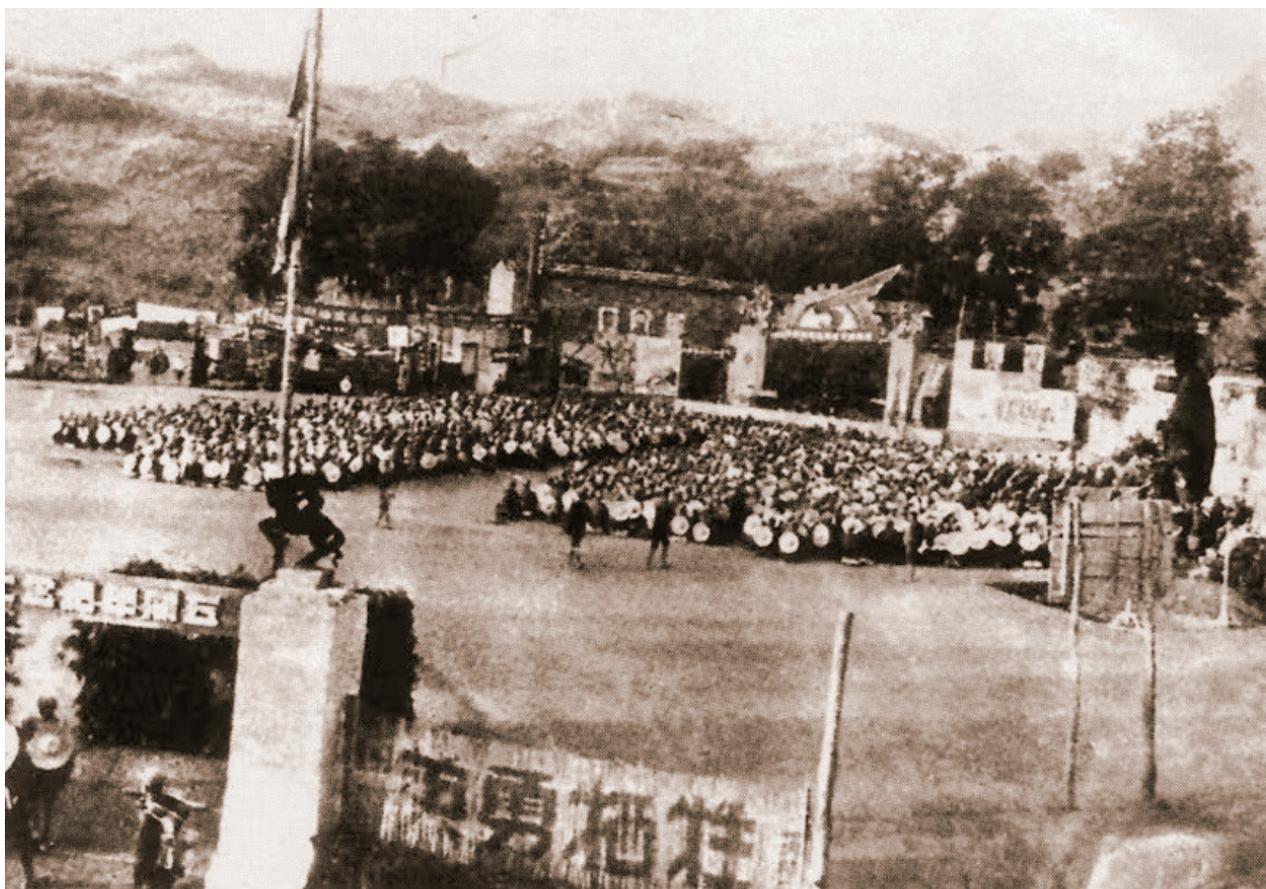
/ 抗大总校编印出版的军事、政治、文化、后勤等教材。教材一共有41种，发行量达18036册，创下了抗大创办后发行量之最。

號召千萬青年志
士革命戰場，高
舉抗大旗幟，插
遍整個中國！
抗大五週年紀念
朱德
彭德懷

/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纪念抗大建校5周年题词（1941年6月1日）。

活动历时七天七夜。其间，白天举行运动会，进行球类、田径和全副武装竞走等18种体育比赛；晚上由文工团表演精彩节目，还举行歌咏比赛。同时，总校还举办展示会，设置“活动舞台”“活动图书馆”，“月地运行仪”等展品引人注目，充分反映了抗大创办5年来，特别是挺进敌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抗大挺进敌后办学，特别是5



/ 1941年，抗大举办建校5周年纪念大会。图为抗大5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周年校庆后，政治影响越来越大，让敌人惊恐万分。冈村宁次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肯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2年5月21日，日寇出动大批兵力，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所在的浆水地区。对于敌人这次来势汹汹的拉网合击，抗大总校早有戒备。在第7期办学时，就曾结合前线的大量



/ 1942年邢台县抗战时期形势图。

战例，制定出一套反“扫荡”的作战预案。即采取敌进我进、方向相反、擦帮而过的战法。当敌人进到“利害变换线”时，校领导针对敌人队形比较密集的特点，将全校分为几个独立行动的分队分别进行转移。途中得知敌人正向总部方向调集兵力，校部随即分成三个部分，由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分别带领跳出合击圈，在路罗与浆水交界的白云山（王莽山）同敌人兜圈子。由于计划周密，“起跳”及时，全校大部分队伍

都先后突围，安全转移到内邱县（现在的内丘县）境内。抗大总校在反“扫荡”中，仍然坚持

边战斗、边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旋，胜利返回驻地浆水镇。



/ 日军挖掘的“封锁沟”。



/ 太行山区广大民兵和群众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等开往前线，支援部队作战。

抗大返回陕北绥德

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为战略反攻做准备，1943年1月，党中央决定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1月24日，总校一部分干部、学员留在晋冀豫边区工作，其余人员踩冰踏雪向陕北绥德进发，并于3月上旬胜利西渡黄河，到达陕北绥德。党中央为加强



/ 抗大在陕北绥德的校址—西山，位于陕西省绥德县名州镇。

抗大的领导，任命徐向前为代理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为副校长。1942年春，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这对于端正抗大学风，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3年，抗大响应党中央号召，

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在何长工的带领下由绥德向东北挺进，于1946年2月到达东北通化，并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至此，抗大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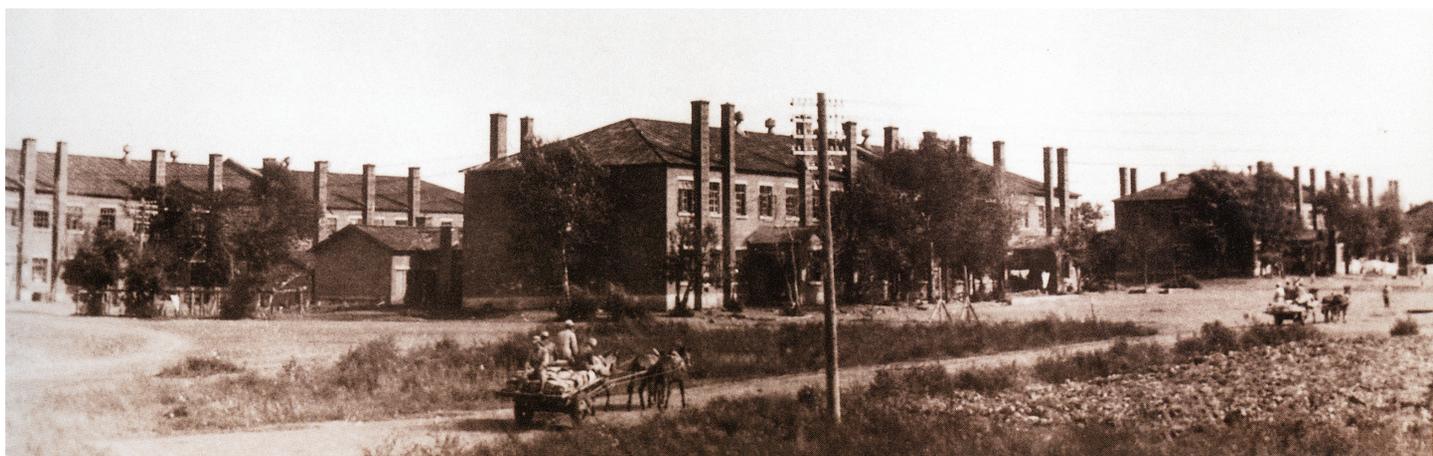
/ 抗大学员学习整风文件。



/ 抗大学员参加大生产。



/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抗大迁往东北。图为当年10月，抗大部分师生东渡黄河，向东北挺进。



/ 东北军政大学黑龙江江北安东大营校址。

抗大之花开遍抗日根据地

在9年多的办学过程中，抗大除总校外，还相继创办了14所分校，抗大的旗帜插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抗大一分校。1938年12月在陕西延长县创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7年，是14所分校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培养干部最多的一所分校，转战华北、华中，斗争环境艰苦卓绝，办学成绩显著。

抗大二分校。1938年12月在延安王家坪成立，1944年3月撤销建制，历时5年多，在敌后边学习边战斗，对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武装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大三分校。1939年7月在陕西延安创办，至1943年1月奉命到绥德与总校合并时结束，历时3年半，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特种兵干部、参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抗大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县麻冢集创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5年半，是新四军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吸收华中和江南革命知识青年最多的一所分校，在豫皖苏边区办学成绩显著。

抗大五分校。分两个阶段，

1940年11月在江苏盐城创办。1942年1月选调出一批干部到三师组织新的五分校，原五分校基础改为华中抗大总分校。新五分校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近5年。五分校是抗大在华中新四军中培养干部的一所重点分校。

抗大六分校。1940年11月在河北省涉县固新镇成立，至1943年冬结束（中间曾与总校合并八个月），历经新、老六分校两个阶段，历时近3年，为坚持在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的129师及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大批干部。

抗大七分校。1941年7月在山西兴县李家湾创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4年多，先是转战于黄河东西两岸，历经艰辛，又转移到陇东地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干部。

抗大八分校。1941年5月在安徽天长县张公铺创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4年多，是新四军所属五所抗大分校中环境比较安定、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分校。

抗大九分校。1942年5月在江苏启东海复镇创办，1944年夏改为“苏中公学”时结束，历时2年，是坚持于苏中敌后游

击战争条件下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的一所战斗化的分校。

抗大十分校。1942年在湖北随县白兆山区创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3年多，是豫鄂边区敌后根据地培养训练干部的一所分校，战斗频繁，流动性大，被称为“背包大学”。

华中抗大总分校。1941年10月成立，1943年结束，历时一年多，负责领导新四军各师的抗大分校和随营学校、教导队培养训练干部的工作。

皖江抗大十分校。1945年5月安徽无为团山里创办，后曾迁至苏北淮阴，同年10月改为新四军第7师随营干部学校，是抗大诸分校中历史较短的分校。

抗大太岳分校。1944年创办，1945年10月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时结束，历时一年多。是为八路军129师第386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培养干部的一所抗大分校。

抗大冀热察分校。1940年9月在拒马河西庄（现北京市房山区）成立，12月反“扫荡”结束后，学校移驻涞水县河东村一带，改编为冀热察挺进军教导大队。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当年的抗大校歌，至今听来仍令人心潮澎湃。抗大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下，先后培养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抗大的历史功绩，已然铭刻在共和国的

基石上，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穿越时空，将继续激励着新时代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抗大各分校概况及培养人数统计

(图表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提供)

名称	时间	校长	活动区域	培养人数(概数)
第一分校	1938.12-1945.9	何长工(1938.12-1939.11) 周纯全(1939.11-1943.7) 袁仲贤(1943.9-1944.6) 曾国华(1944.6-1945.9)	晋东南、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24000人
第二分校	1938.12-1944.3	陈伯钧(1938.12-1940.6) 孙毅(1940.7-1944.3)	河北灵寿陈庄镇地区	20000人
第三分校	1939.7-1941.11	许光达(1939.7-1941.2) 陈奇涵(1941.2-1941.9) 郭化若(1941.10-1941.11)	延安	2600人
第四分校	1940.3-1945.9	彭雪枫(1940.3-1944.9) 张爱萍(1944.9-1945.9)	淮北洪泽湖畔	5000人
第五分校	1940.11-1945.8	陈毅(1940.11-1941.12) 黄克诚(1941.12-1942年春) 钟伟(1942年春-1942.12) 谢祥军(1944.8-1945.8)	苏北盐阜地区	6200人(第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共同培养)
华中总分校	1941.12-1943年初	陈毅(1941.12-1943年初)	苏北、淮南地区	6200人(第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共同培养)
第六分校	1940.11-1945.10	刘忠(1940.11-1942.4) 徐深吉(1943.1-1943.10) 李达(1945.4-1945.10)	山西武乡县、河北涉县	3000人
第七分校	1941.6-1945.11	周士第(1941.6-1943.3) 彭绍辉(1943.3-1945.11)	晋西北兴县、陇东地区	5000人
第八分校	1941.5-1945.8	张云逸(1941.5-1942.2) 罗炳辉(1942.2-1943年冬) 冯文华(1943年冬-1945.8)	皖东	2000人
第九分校	1942.5-1944.6	粟裕	苏中	3300人
第十分校	1942.2-1945.9	李先念	豫鄂边区	5000人
皖江第十分校	1945.5-1945.9	谭希林	皖江区	1000人
太岳分校	1944.10-1945.10	陈赓	太岳区	2400人
冀热察分校	1940.9.1-1940年冬	程世才	河北拒马河畔西庄、十渡(今北京市房山区)	不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抗大中的黄埔师生

□ 刘中璞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自1924年创办以来，以“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将领。众多黄埔军校师生在抗大工作、学习、战斗，为抗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指出：“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抗大三周年纪念》）

抗大总校领导

多位黄埔师生主导、参与了抗大的创办过程，并担任抗大领导职务。曾参与黄埔军校招生、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官学校（1926年并入黄埔军校）教官的毛泽东，是抗大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人。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开办红军学校。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改名为抗大）开始筹办。红大改名抗大后，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制定“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发展，亲



/ 1938年冬，毛泽东在延安给抗大学员作报告。

自领导和推动抗大的各项建设，经常到抗大讲课、作报告，为抗大发展指明方向。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是抗大的创办者和领导人之一。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周恩来发言认为应着重于战术学习，整理过去的经验。6月1日，周恩来出席红大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周恩来是抗大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也被聘为教员。

黄埔军校4期生林彪担任

抗大校长。由于林彪长期在前线带兵打仗，后又赴苏联就医，抗大的实际工作由黄埔军校6期生、抗大副校长、教育长罗瑞卿主持。为解决校舍不足问题，罗瑞卿身先士卒，带领师生挖窑洞建校舍。他领导抗大全体师生克服种种困难，在艰险的环境中坚持办学，使抗大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6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师生转移晋东南。队伍渡黄河、越吕梁、涉汾河，夜间突破国民党军队把守的同蒲路封锁线，历经

3000多里行程完成“小长征”，在晋东南落地生根，继续办学。

1943年3月上旬，抗大总校返回陕北绥德。黄埔军校1期生徐向前担任抗大代校长。他按照毛泽东给抗大制定的“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方针，重点抓“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学员转入正课学习”三大任务，为抗大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抗日战争总反攻培养了大批人才。



/ 1938年冬，毛泽东在延安给抗大学员作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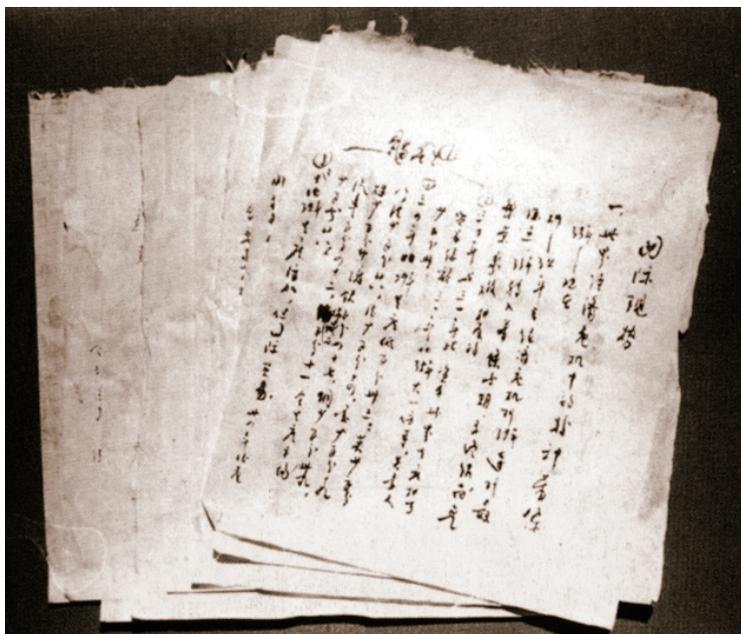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毛泽东

/ 毛泽东出席抗大建校3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

/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 抗大教育委员会委员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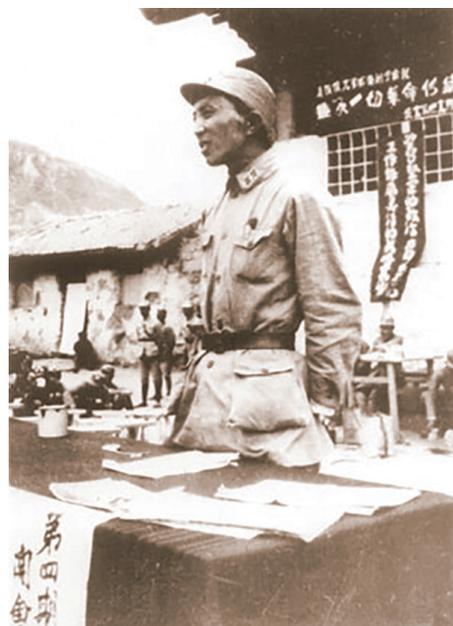
/ 周恩来为抗大作《国际形势》报告的手稿。



/ 1938年8月，周恩来在抗大纪念“八一”暨第4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



/ 1937年抗大迁至延安后，学员激增导致校舍紧张。为解决这个难题，1000多名师生在教育长罗瑞卿带领下走进凤凰山，向荒山要校舍。他们抡起铁锹，在半个月内在挖了175孔窑洞，还修了一条“抗大路”。曾到访延安的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目睹这一奇迹，不禁惊叹，盛赞抗大为前所未有的“窑洞大学”。



/ 1938年5月，罗瑞卿在抗大第4期开学典礼上讲话。



/ 1943年3月，徐向前任抗大代理校长。

继承和发扬抗大的
光荣传统，为改变
老区的面貌而努力。

徐向前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

/ 1986年5月，抗大建校50年，徐向前为坐落于邢台浆水镇的抗大纪念碑题词。

部门、学院、分校负责人

除了担任抗大总校领导外，还有多位黄埔师生担任抗大的部门、学院、分校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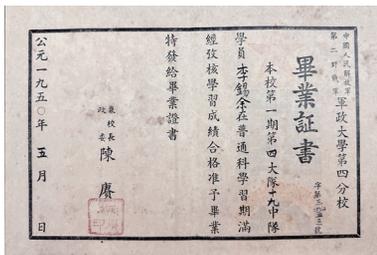
长征中，黄埔军校1期生陈赓担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该团的一部分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编而成。长征途中，干部团既是战斗队，又是一所“流动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干部团经过多次改组、更名，并入到抗大。1944年，陈赓担任抗大太岳分校校长、政委。

黄埔军校5期生许光达，先后出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他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积极开展教学、训练工作，身体力行与学员一同挖窑洞、上山砍柴，还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研究文章，为抗大的教育工作与军事理论研究贡献力量。

被称为“红军大管家”的黄埔军校5期生杨至成，在抗大担任校务部部长。他凭借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组织人员开垦荒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实现粮食自给；组织建立简易被服厂，为师生制作军装；组织修缮教室、制作桌椅，为改善教学条件，保障学校运转发挥



/ 1944年，陈赓任抗大太岳分校校长。



/ 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学员李锡余的毕业证书，由陈赓于1950年签发。

了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1932年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后担任抗大军事学院副院长。他在协助指挥对日作战的同时，重视军队参谋工作建设，为抗大参谋人才培养

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中，抗大一共创办过14所分校，有8位黄埔师生担任分校的校长或政委。在抗大分校，他们全力保障抗大的办学和师生生活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与军事训练工作，为抗大培养大批适应不同战场环境、具备扎实军政素养的抗日人才，为抗大分校的生存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陈毅担任抗大第五分校、华中总分校校长兼政委。他常到分校视察、听课、作报告，与师生交流谈心，要求分校办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与军事并重，亲自抓教学训练工作。

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是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创办者。他十分关心抗大发展，提出抗大军事课程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培养学员的指挥作战能力放在首位。聂荣臻还为抗大筹措经费，为师生筹措衣物，指示部队在抗大转移过程中进行护送，为抗大的生存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陈奇涵担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后调任总校教育长）。他贯彻中央

军委对于抗大工作的要求，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特种兵干部、参谋人员、俄文翻译，以及军事指挥、政工干部等人才。

除此之外，陈伯钧、郭化若、周士第、谭希林等黄埔师生也担任了抗大分校校长或政委等职。



/ 1941年，在延安的许光达。



/ 1938年8月，邹靖华（左，抗大第4期学员）与丈夫许光达（右）在延安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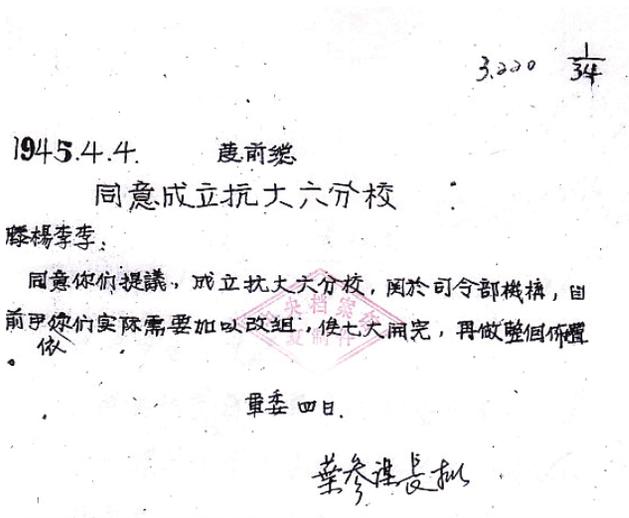
/ 抗大校务部部长杨至成。



/ 抗大干部与教员合影。左起刘忠、杨至成、杨兰史、冯达飞、胡耀邦、罗瑞卿、莫文骅、刘亚楼、王平（女）。



/ 1932年10月10日，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 1945年4月4日，叶剑英批复给滕代远、杨立三、李达、李雪峰の《同意成立抗大六分校》电文。



/ 抗大第五分校、华中总分校校长兼政委陈毅。



/ 1942年，陈毅（左六）、张云逸（左五）同新四军部分干部在淮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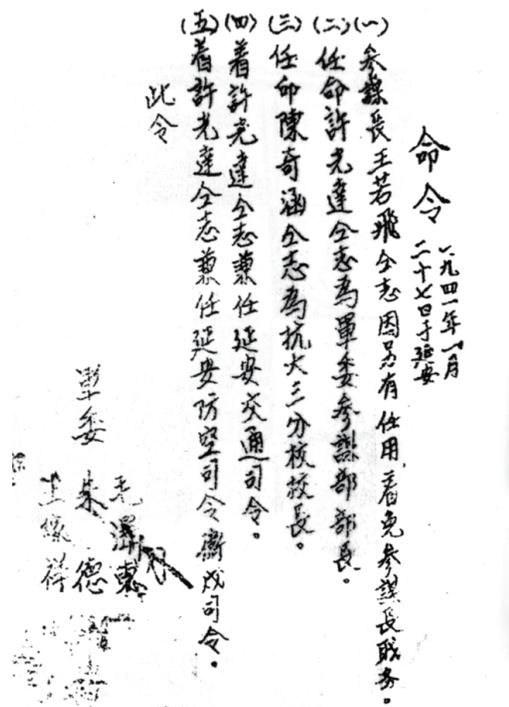
/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创办者聂荣臻。



/ 延安抗大干部合影。左起聂荣臻、刘鼎、罗瑞卿、杨尚昆。



/ 抗大三分校校长陈奇涵。



/ 1941年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命陈奇涵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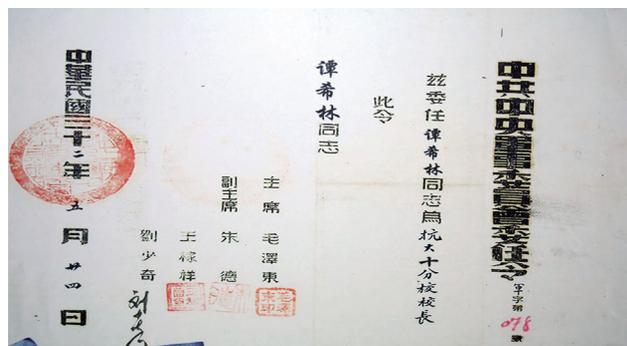
/ 抗大七分校校长周士第。



/ 1940年9月，抗大东北干部队东进途中在八路军120师师部驻地晋西北兴县李家湾与战斗篮球队比赛前合影。第二排左二起：林枫、周士第、续范亭、贺龙、张学思；前排左二高存信。



/ 抗大皖江十分校校长谭希林。



/ 抗大皖江十分校校长谭希林委任令。



1938年春，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并以此为题在抗大进行演讲，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

抗大教学骨干

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黄埔师生凭借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深厚的政治素养，成为军事与政治教学两大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政治教学中，黄埔师生传承了黄埔军校“军事与政治

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始终将培养学员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政治教学的首位。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课、作报告，他在抗大曾发表著名演讲《论持久战》，不仅为学员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还深入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这篇演讲成为指导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纲领性文献，对全国军民坚定抗战决心、明确战略方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课讲



/ 抗大政治教员张庆孚。



/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军需学校党委书记、政委张庆孚（第二排左五）与军需学校1期女生合影。



/ 抗大三分校校长郭化若。

/ 1939年11月，郭化若（左一）、滕代远（左二）与军事通讯专家曹祥仁（左三，抗大3期学员）、王净（左四，抗大2期学员，中央苏区和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立者）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延安）合影。



/ 抗大教员冯达飞，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是中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



/ 红大第1期教员训练班师生合影，第二排右四为冯达飞。

的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从哲学到历史，从抗战形势到战略策略，甚至作风养成、婚恋问题、生产自救等等，讲课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每次讲课，毛泽东总是以恢宏的战略视野、通俗易懂的语言，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抗大学员受益匪浅，多年后都记忆犹新。可以说抗大的讲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宣传的重要舞台之一。

周恩来也多次到抗大讲课、作报告。1938年9月，周恩来来到抗大为学员作《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前途》的报告，深刻阐明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同年10月，周恩来来到抗大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周恩来作

的报告，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加深了学员对党中央抗战路线的理解。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张庆孚在抗大担任政治教员。他以充沛的精力、丰富的学识和革命的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给学员们上好每一堂课。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抗日斗争的形势等等，使学员们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

在军事教学中，黄埔师生根据日军的作战特点和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况，重点开展游击战术、步兵战术、日伪战术研究等课程教学，将理论知识与战场实际紧密结合。罗瑞卿、许光达等在抗大负责教学管理工作。他们凭借丰富的军事教学经验，积极投身于教学方法

的创新实践。他们借鉴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一改传统军校“教员讲、学员听”的单一模式，推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动教学模式，鼓励学员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在课堂上，鼓励有实战经验的学员踊跃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经历，使课堂氛围热烈而活跃。

黄埔军校1期生冯达飞，是红大、抗大最早的教员之一。红大建校之初，教员奇缺，冯达飞担任教员班教员，为抗大培养出第一批师资队伍。在训练场上，冯达飞总是亲自示范每一个动作，要求学员严格把每一个动作做到位，不容许丝毫马虎。他经常在恶劣天气里把部队拉到野外训练，使学员



/ 1940年5月4日，左权（正中站立者）出席抗大总校召开的“五四”青年节大会。左权号召大家“坚决勇敢地投入抗日战争，保卫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

养成勇猛顽强的作风。

黄埔军校4期生郭化若也是抗大教员。他深入研究古今军事理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孙子兵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讲解军事理论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案例，分析其中的战略战术对现代游击战的借鉴意义，让学员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黄埔军校1期生左权，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不仅具

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对军事理论有深入研究。他多次利用战斗间隙到抗大授课、作报告，结合自己在华北敌后指挥游击战的经历，为学员生动讲解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运用技巧，还专门撰写了《埋伏与袭击》等军事教材，成为抗大军事教学的重要教材，深受学员欢迎。

此外，担任抗大教员的还有黄埔军校政治4期生李逸民、洪水等。



/ 左权著抗大教材《埋伏和袭击》。

黄埔师生在抗大粉碎日伪军“扫荡”

由于抗大办学地点处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常面临日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为了学校的生存，抗大学员不光要埋头读书，还要参加战斗，这也为抗大学员提供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宝贵机会。黄埔师生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带领抗大总校、分校学员与敌人英勇战斗。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6期生陈伯钧，担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1939年9月，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企图突袭二分校所在的陈庄。陈伯钧等及时制定应对方案，带领二分校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敌军战斗。9月27日凌晨，敌军偷袭陈庄，留守的抗大二分校1大队发现敌情，当即开火阻击。与此同时，陈庄军民被迅速转移。在其后的战斗



/ 抗大教员、政治部科长、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李逸民。



/ 1938年5月的政训队合影，前排右三为李逸民。

中，二分校师生对进占陈庄之敌进行彻夜袭扰。经过激烈战斗，主力部队在二分校的配合下全歼来犯之敌，取得陈庄大捷。

1941年秋季，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将“消灭抗大”作为其重点目标之一。黄埔军校4期生、抗大二分校主任教员洪水带领师生100多人转移。面对强敌的包围，他们昼伏夜行，

与敌人周旋于群山密林之间。最后，洪水找准日军薄弱之处，率部发起勇猛冲锋，一举突破日军包围，成功转移，最终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学员、红大1期学员陈士榘，1939年组织兵力掩护抗大一分校3000多师生通过日军同蒲铁路封锁线，为一分校安全转移晋东南提供了有力支持。



/ 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



/ 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等视察学员演习场地。



/ 抗大二分校主任教员洪水。



/ 洪水（二排左一）与抗大二分校干部、学员们在一起。



/ 红大1期学员陈士榘。



/ 1936年，红大1期学员打网球合影。左起赵尔陆、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萧文玖。

到延安去——黄埔学子响应时代号召

1936年红大成立时，招生对象主要是红军干部；1937年改名抗大后，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青年乃至海外华侨，凡是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的健康青年均可报考。一时间，“到延安去”成为当时青年最时髦的口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青年也响应号召，奔赴延安，入读抗大，其中就包括一些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例如黄埔军校代校务何遂之子、黄埔军校10期生何世庸，1938年入读抗大。据他回忆，抗大和黄埔军校的教学风格明显不同。黄埔军校施行严格、正规的德式军事教育，而抗大教授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重点教授游击战术。毕业后，何世庸在抗大留校任教。

结论

黄埔军校和抗大这两所“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军校，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两所学校校友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长城，共同谱



/ 爱国青年云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七贤庄，报名到抗大去。（1938年6月，英国《每日简闻报》记者詹金斯摄）。

写了抗日救亡的壮丽篇章。众多黄埔师生在抗大工作、学习、战斗，他们有的担任抗大的主要领导人，是抗大的主要筹办者，为抗大发展指明方向；有的担任抗大的部门和分校负责人，为抗大的创办和发展付出巨大心血，带领抗大师生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战斗；有的是抗大的教学骨干，扎根教学一线，为抗日战争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中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5位元帅、3位大将、6位上将、6位中将、3位少将，还有著名的革命烈士。

黄埔师生在抗大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为抗大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重大贡献。我们要铭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和抗大英烈，继续传承和弘扬黄埔精神和抗大精神，为推进强国建设、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
2. 刘波、刘德茂著，华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抗大将星》。
3. 孙毅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在战火中办学》。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陕西文史资料（第十辑）》。

抗大中的部分黄埔师生名单

(注: 由于抗大未编印完整的同学录, 因此无法准确统计抗大中的黄埔师生名单。此表格名单为部分名单。)

姓名	抗大经历	黄埔军校经历
毛泽东	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招生复试工作、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官学校(1926年并入黄埔军校)教官
周恩来	抗大教育委员会委员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	抗大代校长	黄埔军校1期生
叶剑英	抗大军事学院副院长	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陈毅	抗大第五分校校长兼政委、抗大华中总分校校长兼政委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
聂荣臻	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创办者	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
林彪	抗大校长	黄埔军校4期生
罗瑞卿	抗大副校长、教育长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6期生
许光达	抗大训练部部长、抗大三分校校长	黄埔军校5期生
陈赓	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抗大第2期学员、抗大太岳分校校长兼政委	黄埔军校1期生, 第2期入伍生连长, 第3期步科副队长
陈伯钧	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抗大二分校校长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6期生
陈奇涵	抗大第三分校校长、抗大总校教育长	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
周士第	红大1期第二科科长、抗大第七分校校长	黄埔军校1期生
陈士榘	红大1期学员, 掩护抗大第一分校转移(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支队司令员)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学员
张宗逊	红大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	黄埔军校5期生
杨至成	抗大校务部长	黄埔军校5期生
郭化若	抗大第三分校校长、抗大军事学院教育长	黄埔军校4期生
阎揆要	抗大教育长	黄埔军校1期生
倪志亮	抗大第2期第2队队长	黄埔军校4期生
彭明治	红大1期、抗大2期学员	黄埔军校1期生
常乾坤	抗大三分校工程队大队长	黄埔军校3期生
谭希林	抗大皖江第十分校校长	黄埔军校5期生
王诤	抗大2期学员	黄埔军校6期生
左权	抗大教员	黄埔军校1期生
袁国平	红大第三科政委, 红大第二校政委, 抗大附设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	黄埔军校4期生
曹广化	红大1期、抗大2期学员	黄埔军校4期生
洪水	抗大教员、抗大二分校主任教员	黄埔军校4期生
李逸民	抗大教员、抗大政治部科长、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4期生
冯达飞	红大教员、抗大教员	黄埔军校1期生
曾希圣	抗大2期学员	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
张庆孚	抗大教员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何世庸	抗大5期学员、抗大教员	黄埔军校10期生

赖清德正在将台湾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 彭韬

近日，赖清德召集所谓“国安高层会议”，抛出所谓“守护民主台湾国家安全行动方案”。他公开宣称大陆“正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为此，他推出“两大行动方案”和“13项具体行动”，以具体因应所谓“中国并吞台湾、称霸印太的野心”。这是继赖清德2025年3月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抛出所谓“17项策略”后，又一次大肆渲染大陆“威胁”的举动。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鼓吹“台独”分裂谬论，限缩两岸交流，以“安全”之名，多次向美国购置军备，推动两岸“脱钩断链”，升高台海紧张局势，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赖清德宣扬大陆“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绝非所谓的“提醒台湾应对安全风险”，而是一场充满政治算计的恶意操弄，核心目的围绕巩固自身政权、谋取选举利益、绑定外部势力等展开，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引发岛内恐慌，骗取选举选票

2027年正值台湾地区政权交接的关键选举节点，这也是赖清德炒作该论调的重要原因。他通过编造虚假的“武统时间表”，刻意制造全民恐慌，贩卖“芒果干”（亡国感），以此强化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负面认知。同时他打着“保卫台湾”的旗号，将自己塑造成能对抗大陆的台湾“守护者”形象，借此煽动“反中抗中”情绪捞取政治利益，掩盖其执政以来在全领域的治理无能。

高额防务预算，涉嫌利益输送

赖清德借这一虚假论调，顺势提出未来8年投入1.25万亿新台币建构“先进防卫作战体系”，还计划让2026年度台防务预算超过GDP的3%。这笔巨款本可用于台湾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福利，足够给全台老人加发3年长期照护津贴，也能让全岛小学生吃5年营养午餐。但他执意将资金投入军购，一方面能让“台独”政客借军购项目中饱私囊，另一方面还能讨好美国军火商，为自身的“台独”分裂活动换取更多外部武器支持。这分明是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为自己的分裂图谋买单。

绑定美国势力，巩固自身政权

赖清德此举也是在和美国的相关论调唱和，主动配合美国“以台制华”的操弄。美国智库与军界早有解放军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的猜测，赖清德刻意将其扭曲为“大陆以2027年武统为目标”，就是想通过制造台海紧张局势，迫使美国在对台军售、安全承诺等方面给出更明确的表态。另外他也可以借此打击在野的蓝白势力，压制内部不同声音，将全台绑上他谋“独”挑衅的“战车”，加强营造“去中”“抗中保台”的肃杀气氛，为推进“台独”分裂扫清一切障碍。

增加民众负担，巨额军购挤压民生支出

2025年以来，美国已批准多项对台军售，总

额高达 7166.6 亿元新台币，其规模已远超常规军备支出，直接挤压了岛内民生领域的财政预算。但赖清德当局却绝口不提岛内民生问题，又接连抛出 1.25 万亿元新台币特别防务预算案，并承诺 2030 年将军费提升至台湾地区 GDP 的 5%。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称以“备战”换取和平，本质是牺牲台湾民众的利益作为“台独”冒险的筹码。“倚外谋独”的财政支出，已严重挤压教育、医疗、养老、青年住宅等民生领域的资源分配，导致岛内民生困顿、财政负担加剧，岛内民众的生活品质与发展权益受到直接冲击，加剧了岛内社会矛盾与财政风险。

对美予取予求，勾连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

台积电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军者，在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被誉为台湾的“护台神山”。而赖清德当局上台后，为实现“倚美谋独”，主动出卖台湾优势核心产业，将台积电产业链转移到美国。2025 年 3 月，民进党当局宣布在对美国原有的 650 亿美元投资外，再追加 1000 亿美元投资。随后，台积电又在美投资 3000 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立全世界最大芯片厂。台湾当局声称此举是为了让台美关系更紧密，实际上是将台湾利益送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台积电产业的外流，直接冲击到台湾本土产业根基，弱化台积电产业在全球的地位以及引发台湾就业市场剧烈震荡。首先，台积电在台湾拥有庞大的员工队伍，其迁移将直接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其次，与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厂商也可能因业务减少而裁员，加剧台湾就业压力；此外，台积电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工艺，其迁移美国可能导致技术外流，使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技术自主性

受到削弱。

制造两岸对立，破坏交流压缩合作空间

众所周知，两岸关系好坏是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赖清德抛出所谓“守护民主台湾国家安全行动方案”，鼓吹“台独”分裂谬论，大肆渲染大陆“威胁”，把两岸交流合作视作大陆对台湾的“威胁”，煽动岛内民众对大陆的敌视与仇恨，并加大对参与两岸交流人员的恐吓与压制。他的这种做法破坏了两岸交流合作的良好氛围，使得许多国际企业和组织因担忧台海局势不稳定而对与台湾合作持谨慎态度，台湾在国际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空间因此受到极大压缩。两岸关系不好也使得台湾许多企业失去了大陆或国际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赖清德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台湾的民生经济，向美国军工复合体换取保障，借“大陆威胁”渲染制造焦虑，裹挟民意推动防务预算，实质是为“台独”而战，而非真正守护民众福祉。2025 年 12 月 2 日，蓝白党团联手以 10 票赢过绿营 9 票，挡下 1.25 万亿新台币特别防务预算，相关采购特别条例暂缓列案。后续赖清德仍会继续操弄“抗中保台”，但历史终将证明：任何以牺牲台湾利益换取政治私利的行径终将失败。广大台湾同胞应当擦亮眼睛，认清“台独”的欺骗性、危害性，千万不要成为“两岸和平破坏者”“麻烦制造者”的帮凶。否则，在赖清德的政治操弄下，台湾不仅不会得到保护，反而会一步步走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5年10月—11月

□ 吴亚明

10月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多个特展庆祝建院100周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庆系列大展3日由“晒宋——故宫宋版图书观止”揭开序幕。“晒宋”特展两个档期共展出98部宋版书，其中首档展出的50部宋版书中，19部为孤本，极具历史与文化价值。

台湾制造业持续惨淡，专家警示将对经济造成冲击

数据显示，台湾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继续位于收缩区间，8月制造业景气灯信号也亮起代表衰退的蓝灯。岛内专家和业界指出，这表明众多制造业产业持续低迷，将对台湾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

台湾总人口连续21个月负增长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为2331.70万人，连续21个月负增长。

公安机关依法征集台军“心战大队”核心骨干违法犯罪线索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11日发布悬赏通告，征集颜嘉宏等18名台湾军方“政治作战局心理作战大队”核心骨干违法犯罪线索。

台湾历史照片集中亮相武汉，展现“隔海呼唤祖国的台胞心声”

11日，“隔海呼唤祖国的台胞心声——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图文展在位于武汉市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幕，来自台湾苗栗县、嘉义市等地民众，以及在鄂台胞、两岸青年学生代表等数百人参加开幕式并观看展览。

两岸近3000人在厦门同跑“永庆杯”

12日上午，以“为爱奔跑，老幼同心”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永庆杯”路跑活动在厦门长庚医院启动，海峡两岸近3000名路跑爱好者聚首厦门，同跑“永庆杯”。

“台湾光复与南海诸岛收复主题展”在南京大学举行

13日，由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和图书馆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与南海诸岛收复主题展”在南京大学举行，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揭幕仪式并参观主题展和特藏馆。

《沉默的荣耀》热播，国台办：激励两岸同胞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懈奋斗

大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引发岛内媒体关注和报道。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5日应询表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先烈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质，必将激励两岸同胞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2025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京举办

以“百团牵手 百花齐放”为主题的2025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16日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和朝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近百个台湾民间社团的360余名台湾嘉宾参加。

“光耀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书

画展在北京举办

以“光耀中华·民族复兴”为主题的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书画展17日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80余位文化界人士参加。书法、国画、油画等80余幅精品以笔墨致敬历史，以丹青共绘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

第五届和平发展论坛在香港举办

第五届和平发展论坛17日在香港举办，论坛围绕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共促统一等内容展开，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80周年。

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中国国民党18日举行党主席选举，候选人郑丽文获得65122票，得票率为50.15%，当选党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9日致电郑丽文，祝贺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

第十二届“大江论坛”聚焦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

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二届“大江论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中国心·民族魂——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为主题。

台湾民众到马场町公园缅怀吴石、朱枫等烈士

大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岛内引起反响，连日来，不少台湾民众到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摆上祭品、鞠躬致哀，悼念当年在此牺牲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

湾光复纪念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4日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并规定国家通过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

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2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举办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招待会

25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招待会，台湾各界嘉宾、大陆有关方面代表人士出席。

《不屈的宝岛 丹心向祖国——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在北京举办

为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不屈的宝岛 丹心向祖国——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2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

公安机关决定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洋立案侦查

重庆市公安局28日发布警情通报表示，为坚决打击沈伯洋通过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决定对沈伯洋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纪

念台湾光复80周年，维护联大第2758号决议权威”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主持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津台会累计达成意向投资额1238亿元

29日，第十六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自200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5届，累计促成签约台资项目350余个，达成意向投资额约1238亿元。

第16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聚焦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

第16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29日在贵阳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文化界代表就“全球视野下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与国际传播”主题展开对话。

第十六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启幕

30日，以“一脉传承·创意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厦门举办。

第十八届黄埔论坛在湖南怀化召开

以“铭记抗战历史，纪念台湾光复，共促祖国统一”为主题的第十八届黄埔论坛30日在湖南怀化举办。

11月

台湾各界人士呼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

“两岸关系的谈判协商：从回顾中找解方”座谈会6日在台北举行，上百名台湾各界人士参会。与会嘉宾回顾两岸交流交往的历史，呼吁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增进两岸沟通对话、恢复两岸协商谈判。

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十周年，国台办：愿在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团体人士共推两岸关系发展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7日表示，2015年11月7日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大举措，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将两岸政治互动提升到新高度，成为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与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对话沟通、交流交往，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郑丽文：“九二共识”可带来两岸和平，国民党将坚定走正确路线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7日在台北一场研讨会上表示，2008年至2016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频繁交流，迎来“春暖花开”。事实证明，“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局势缓和、和平交流，国民党会坚定地在正确路线上继续走下去，成为主动的、关键的和平缔造者。

两岸学者共研台海新局：把握变局机遇，共促祖国统一

以“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台海新局与变局”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8日在河北雄安开幕。与会学者认为，当前，台海形势正经历深刻演变，两岸智库和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坚守历史责任与统一使命，引导两岸民众正确认识历史大势，增进互信与共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台湾各界秋祭白色恐怖死难者，呼吁携手推进统一大业

“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8日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上百名来自台湾各地的白色恐怖幸存者、受难者家属及各界人士参会，向牺牲烈

士致敬、默哀。

海峡两岸暨港澳人士探讨人工智能协同赋能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海峡两岸暨港澳互联网发展论坛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的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媒体代表，以“协同赋能·智创未来”为主题，共同探讨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区域协同创新，展望数字时代融合发展前景。

第二十一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聚焦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新机遇

第二十一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1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论坛以“共享AI时代新机遇，推进桂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与会两岸嘉宾期待以人工智能为新契机，深化经贸文化合作，携手拓展东盟市场，共促融合发展。

日本领导人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外交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领导人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国台办：日本领导人在国会公然发表的涉台恶劣言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2日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领导人在国会公然发表的涉台恶劣言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第十一届中华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

以“两岸融合发展与两岸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华文化论坛，12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新形势下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和方式等议题展开讨论。

公安机关悬赏征集台湾网红温子渝、陈柏源违法犯罪线索

13日，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发布悬赏通告，征集台湾网红温子渝（网名“八炯”）、陈柏源（网名“闽南狼”）违法犯罪线索。

第十七届海峡两岸茶博会吸引173家台企参展

第十七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16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办。茶博会共吸引85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来自台湾的企业173家。

两岸书画作品公益展在北京开幕，百幅佳作共绘家国情怀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书写抗战系列活动：民族浩气 翰墨千秋——2025两岸书画作品公益展”北京展17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

第五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四川举行，王沪宁致贺信

以“铭记历史、捍卫成果、守护家园、开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20日在成都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贺信。

台湾青年影视文化人才交流营活动在北京举办

台湾青年影视文化人才交流营活动在北京举办。数十名两岸导演、编剧、演员、摄影师等影视文化界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共话两岸影视合作机遇和产业融合发展前景。

第16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台北展举办

28日，第16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台北展在台湾艺术教育馆举办，展出近300幅来自海峡两岸、港澳及马来西亚华人地区青少年的精彩作品，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童趣的艺术飨宴。 

我的黄埔情缘

——怀念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老人们

□ 高燕茜

在《内蒙古黄埔同学风采录》一书里，有一张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时的合影，会员们齐刷刷佩戴着红色的胸牌，唯有站在第二排最右边的年轻女士没有胸牌，那便是当年的我。记得当时，我对好了照相机的焦距，交给工作人员，再急急跑去会员身边，拍成了这张照片。

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以下简称内蒙古同学会）是1989年4月7日在呼和浩特成立的，我是黄埔二代，又是《中国环境报》驻内蒙古的记者，荣幸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至此，每当开会和举办活动，秘书长高启柏都请我参加并让我邀请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当时媒体的稿件大多都是我提供的。我还在《黄埔》《甘肃黄埔》《老年世界》《内蒙古日报》等媒体陆续发表了《缅怀侯镜如会长》《文强将军塞外行》《修书告慰在天灵》等专访文章。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会成



／ 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民革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崔维岳致词。

立25周年，内蒙古同学会准备出版《内蒙古黄埔同学风采录》一书。时任秘书长银利民特邀我担任该书的副主编，我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并撰写了多篇文章。为了使该书早日出版，我推荐了内蒙古历史研究学者陈贵敏先生参与编辑，收录了他写的一批有关蒙古族优秀黄埔学子的文章，包括荣耀先、白海风、王秉章、朱实福、荣尚义、云

继先、陈应权等人的事迹。书中也收录了我拍摄的许多照片。

内蒙古同学会成立伊始，内蒙古在世的黄埔老人有近400名，其中呼和浩特市不足百人。同学会没有人员编制，没有交通工具，经费也很少，仅有两间办公室且缺乏办公设备，开展工作较困难。我常骑着自行车为同学会跑腿，如联系相关部门、请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

电视台及其他媒体的记者，为各项活动拍照。那时有照相机的人很少，而且都是用胶卷拍摄。我是国家级报纸驻站记者，配有一部美能达照相机，我用自己买的胶卷为黄埔同学拍照，之后到照相馆洗印好，再将照片送给他们，使他们颇为感动。

当时同学会每月有四次集体活动。每到星期四下午，会员们便兴致勃勃到民主党派大楼来相会。当时他们大多六七十岁，参加活动都很踊跃，开会从不迟到早退。开会时个个坐姿端正，会前必唱黄埔校歌。会上先由秘书长介绍国内外形势，内蒙古改革开放成果以及同学会对外联络、招商引资情况等。然后由同学们自由发言，气氛十分热烈。会议室桌上摆放着《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黄埔》杂志等刊物。大家随意翻阅着、议论着。他们还经常配合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举办大型座谈会，有一次将我也列入重点发言人之一，我诚惶诚恐坐在主席台上给这些老人们讲话，颇感荣幸。这些曾经的职业军人，大多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抗日战争，虽已进入暮年，但身板硬朗。几位会长、常务理事等后来都年过百岁。改革开放后，这些老人个个如沐

春风，积极联络海内外同学，全身心投入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大业中。黄埔老人中不乏多才多艺者，会议结束后或演唱或进行书画创作，气氛十分活跃。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埔 17 期的马维德，京剧唱得有板有眼。内蒙古的京剧名角鲍绮瑜女士是黄埔二代，她也经常被请来同学会参加活动。那些年，每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我都给会员们拍照留念。我还征集了黄埔老人的老照片，在许多新闻媒体发表。如《内蒙古画报》还予以整版刊登，提高了内蒙古同学会的声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获得有关黄埔军校的资讯更加便捷。我经常浏览与黄埔军校相关的网站，受益匪浅，还帮助许多黄埔后代找到了先辈珍贵的资料。我获知湖南档案馆是目前保存黄埔资料相对较为完善的机构，只要提供黄埔前辈的姓名和期别，档案馆就会将照片资料寄来。就在近期，黄埔 9 期同学郭熙智的后代王强就通过我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亲人当年神采飞扬的黄埔毕业照。

我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上级领导的机会较多，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白兴武来内蒙

古考察时，希望与自治区政府主席云布龙会面，高启柏秘书长便找我促成此事。因为云布龙之父云蔚与我父亲高宪岗是黄埔 9 期骑兵队同学，而且两人关系颇好，两人的子女也经常来往。内蒙古同学会会长田绥民收到同期老同学蒋纬国从台湾的来信，也是我陪同去向云布龙主席汇报的。云布龙主席虽然身居要职，但闲暇时也到我家与我们夫妇谈古论今，这都缘于我们的黄埔之情。

田绥民是黄埔 10 期生，是我父亲的同乡师弟，父亲总称他为小田霖（笔名）。田绥民虽历经磨难，但活过 100 岁依然身体健康，所以连任几届内蒙古同学会会长。他常住乌海市，每到呼和浩特市开会，都要打电话约我见面，嘱托我有关黄埔后代工作的事情，一直鼓励我牵头成立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家属联谊会。在他之前，黄埔 4 期同学文强曾两次到呼和浩特市，第一次是 1989 年作为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前来祝贺内蒙古同学会成立；第二次是 1991 年随全国政协委员到内蒙古考察。我都采访报道过。文强对内蒙古同学会工作很关心，希望黄埔二代也多作贡献，回京后专为我寄来上海等地黄

埔军校同学会发展二代联谊会的有关资料 and 文件，为此我专门找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分管统战工作的千奋勇副书记，请求支持成立内蒙古黄埔二代联谊会。在田绥民和文强的支持下，我联系了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方很快发来上海黄埔同学家属联谊会组织条例及入会申请表。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内蒙古黄埔同学家属联谊会一直没有成立起来。田绥民晚年时，将自己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字资料 and 照片都交给我珍藏。同时我还精心保存着文强给我们夫妇的诸多来信和资料。

田绥民与蒋纬国是同期同学，当年在军校，他当过蒋纬国的军事训练队队长，两人结下深厚友情。他在给蒋纬国的信中追忆同窗之情，语重心长地述说大陆与台湾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蒋纬国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赞誉田绥民在内蒙古建设中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自己晚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不久，蒋纬国又来信说自己身体欠佳，正在治疗中。田绥民当即买了周林频谱治疗仪，和几本民革出版的杂志一起托人带到台湾。蒋纬国颇为感动。蒋纬国夫妇还给田绥民寄来节日贺卡等。不久，传来了蒋纬国逝世的消息，田绥民深感痛惜。

1989年，台湾内蒙古籍黄埔同学贾如灏等17人组成观光团来到呼和浩特，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的热情款待。贾如灏夫妇还专程到乌海市田绥民会长家中做客，亲身体会了家乡的风土人情，看到了家乡的巨变。1994年，贾如灏来信，希望田绥民为在台湾去世的五位内蒙古籍军人寻找继承遗产的亲属，田绥民收到来信立即与各有关部门联系，为台湾同胞寻找大陆亲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为其中三位找到了家乡的亲属。2000年，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创办人张岳轩携夫人、子女一行来到呼和浩特，田绥民代表内蒙古同学会接待，并共同商讨反“独”促统事宜。

黄埔19期生高启柏多年担任内蒙古同学会秘书长。他于1982年退休后又在统一战线工作了22年。他是经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介绍加入内蒙古民革的，曾参与筹建内蒙古民革并担任秘书工作，其间积极创办内蒙古民主党派第一个高考补习班，为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贡献。他还参与创办全国民主党派首家民办书店——“中山书店”，发行图书和教材，同时解决了一些民主人士子女的就

业问题。他担任内蒙古同学会秘书长期间，遵循“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充分调动黄埔同学为促进祖国统一出力。在每年春节、中秋及内蒙古那达慕盛会期间，同学会都号召会员向港澳台黄埔同学及后代发出邀请，先后与台湾陆军少将黄行钧、定居美国华盛顿的吴光朝将军、定居美国的原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中将司令官戴坚等取得了联系。高启柏给台湾同学叶品录去信，约他和夫人曹玉洁到内蒙古访问，从通信中惊喜得知总队的黄埔同学在台湾的达400余人，这都是他急需联系的对象。经同学们共同努力，同学会与台湾的黄埔同学、亲友300余人取得了联系，收到信函千余封。同学们向在台同学及亲属宣传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介绍了改革开放大好形势，邀请台湾同学组团来内蒙古探亲、旅游、观光、投资，致使台湾和海外黄埔同学和社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来到内蒙古访问。内蒙古同学会和台湾的台北、高雄、新竹、台南、嘉义、凤山、桃园等10余个县市，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巴西的圣保罗，加拿大的多伦多等

城市的黄埔同学建立密切联系，通过信函、国际长途电话，沟通认知、加深感情，并随时了解海外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推动祖国统一、助力国内经济建设、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黄埔 20 期同学马维驯、郭之青等想方设法通过亲友、同学、同事和有关组织联络两岸黄埔同学，通过书信往来，向台湾同学详细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台湾同学对祖国大陆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在与台湾同学蒋维山、贺大良、徐进宝、王以中等人的交往中，充分表达两岸骨肉同胞不能分离、海峡两岸应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张慧士是台湾高雄马术协会的成员，与马维驯是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同一宿舍住上下铺的室友。张慧士来呼和浩特进行马术技艺交流，参加赛马友谊比赛。赛场上，马维驯与张慧士挽缰纵马，并肩奔驰，英姿不减当年。

内蒙古同学会副会长闫秉心是一位精神矍铄、乐观通达的老人，他坚持练习“床上八段锦”和自编的健身操。他的口头禅是“活动，活动，想活就得动”“想得开，放得下”“有容乃



/ 作者（右一）陪同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白兴武（左一）会见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布龙（左二）。左三为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高启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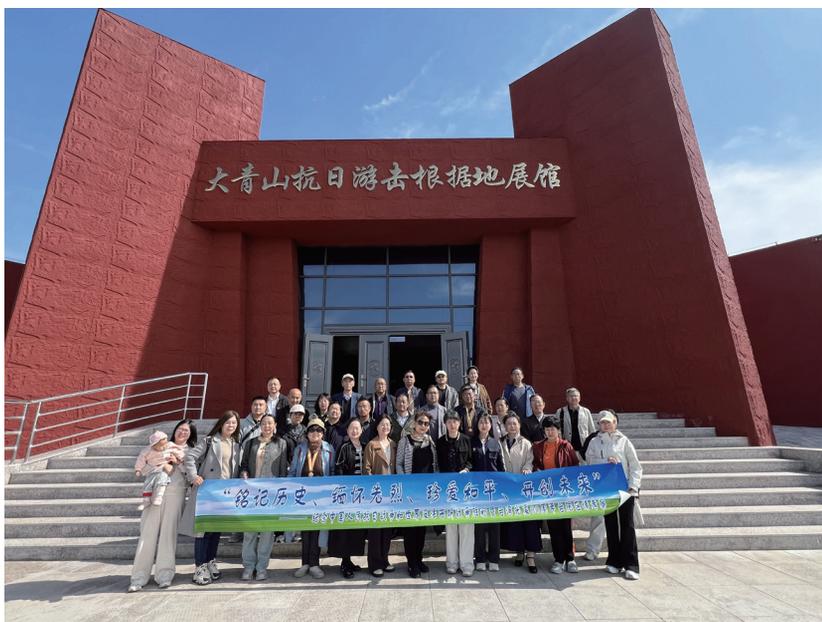
大，无欲则刚”。闫秉心做过许多工作，不管是当老师、当工厂的保管员、当机关干部，都留下工作能力强、热爱学习、诚恳待人、淡泊名利、克勤克俭的好名声。步入耄耋之年，闫秉心仍然思维敏捷。他就像一个“活字典”，许多人找他求证内蒙古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他都如数家珍，如某某人上过哪个学校、哪个班，他都一清二楚。我有位表姐贾美美，她的父亲贾广义是继我父亲之后考入黄埔 13 期的，她从小失去父亲，家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她到呼和浩特与我相认后，急切地想了解更多有关父亲的情况。由于黄埔老人都年事已高，找线索很难，

但我马上想到了健在的闫秉心副会长，便陪同表姐去闫老家中，果然不虚此行，了解到闫老与表姐的父亲竟然是同期。见面时，闫老与表姐如同一对失散多年的父女，抱头痛哭。通过与闫老多次谈话掌握的资料，表姐为她父亲出版了专著。表姐的儿子贾国龙创建了享誉中国的西贝餐饮总公司并任董事长，他的社会职务和荣誉很多，但表姐说，他家最得意的还是黄埔后代这个光荣身份。

黄埔 15 期同学马毓泉是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教授，与我同住在一个校园。马毓泉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每在校园里遇到都会聊一会儿。他著述颇丰，

成果累累。《内蒙古植物志》就是他主编的。他十分热衷同学会的工作，每次活动都按时参加，有时还携夫人共同参与。

黄埔同学在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3期王晶同学为了更好地传播农牧业科学技术，先后撰写科普作品36篇。其中《社员养鸡大有可为》一文荣获内蒙古科协颁发的“优秀科普作品奖”，并选编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优秀科普作品选》中。文章《社员养鸡常识问答》《怎样提高母鸡的产蛋率》荣获呼和浩特市科普创作奖。他多次应邀出席华北地区和内蒙古兽医学会举办的年会进行学术交流。他将科技用于实践，与其他专家一起前往察哈尔右翼前旗泉玉林水库养鸡场开展咨询服务工作，使该场扭亏为盈。由于王晶的出色工作，他在1986年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各界爱国人士为四化做贡献表彰大会”，获得奖牌。他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政议政，坚持下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撰写提案、论文等。王晶无怨无悔为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倾尽自己的心血。他常说，黄埔精神可以在战场上体现，如今把工作做好也同样体现黄埔精神。



内蒙古黄埔后代参观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

黄埔16期同学陈家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蒙古族老人，他晚年与高启柏秘书长等几位黄埔老人无私地投身于服务内蒙古同学会的日常工作，天天驻守在同学会办公室，没有任何报酬。我每次到同学会，总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陈家驹对每位到访者都笑脸相迎，端茶倒水，事无巨细为大家服务。

随着年龄的增长，黄埔老人渐渐体弱多病，来同学会活动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终于停止了每周的集体活动。内蒙古相关部门对黄埔老人十分关心，经常到家中拜访慰问，逢年过节和寿辰，必送上礼物祝贺。

以上所书的老人们如今都已作古，在多年相处中，我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可谓忘年之交。与内蒙古同学会这段黄埔情缘占据了我生命的重要位置，使我深深怀念。我珍藏了许多和同学会有关的物件，如厚重的《黄埔军校史料汇编》，有关黄埔军校的邮册，内蒙古同学会成立10周年、20周年的纪念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翻看。我作为黄埔二代，有责任将黄埔老人的故事讲述出来。我们既要牢记历史、缅怀先辈，更要珍惜现在、开创未来。我们要学习老一辈黄埔人，热爱祖国，艰苦奋斗，共铸民族复兴伟业！

黄埔小史料 传承大精神

□ 吴坤坤

我的曾祖父吴鸿书是黄埔军校第4期的行政教官，他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2期，是张与仁团长的副官。2023年11月，作为黄埔教官的后人，我第一次来到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看着古朴的校门、一排排宿舍、孙总理纪念馆……仿佛被拉回到了黄埔军校初创的那个年代。走进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看着一件件文物，我眼眶禁不住湿润了，望着墙上陈列着的整齐的教官服，仿佛看到了曾祖父当年的模样。

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我看到了大门两旁那副赫赫有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还看到了刻有“亲爱精诚”字样的碗碟，各期黄埔同学的毕业证书，甚至是关禁闭的小房子。可想而知，黄埔军校当年是多么重视革命精神的培养，对学员的纪律管理是多么严格。

这次黄埔军校旧址之旅，让我对黄埔文物史料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黄埔军校史料是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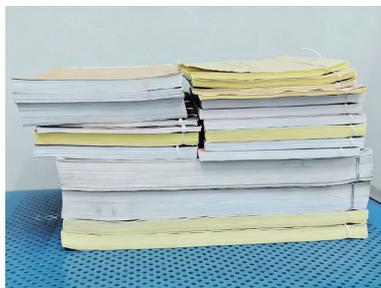
形成于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段时期，与黄埔军校相关的正式出版和非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照片等各种资料类型，是开展黄埔军校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支撑，尤其是校史资料、人物资料、校规资料、教学资料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黄埔军校旧址返回广西后，我开始关注和黄埔军校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听说南宁黄埔军校同学后代亲属联谊会有人在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黄埔军校同学录等资料，进行复制后捐赠到各地档案馆，我非常兴奋，急切地想认识并拜访这位黄埔亲属。

后来，几经周折，我终于打听到他叫黄成涯，广西武鸣人，是黄埔军校六分校14期学生黄斐之孙。经了解，近10年来，黄成涯利用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各种交流机会，收集到近50本黄埔军校同学录以及

民国时期其他军事培训机构通讯录等资料。一方面，他通过走访黄埔同学或抗战老兵，对他们珍藏的实物资料进行扫描。为了接近黄埔同学或老兵家属，黄成涯稍有空闲就去他们家里拜访，冒着风雨也要去，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位住得比较偏僻的同学或老兵，需要翻山越岭、一路寻问，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甚至一整天的功夫，才能找到同学或老兵的家。另一方面，黄成涯还结交了一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向他们请教，互相分享黄埔史料。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来到黄成涯的工作室拜访，了解并近距离观摩了同学录、通讯录的整个复制过程。黄成涯告诉我，每次收集到新的同学录，首先要核实资料的真实性，接着开始在电脑上进行模板制作。这模版又有一定的讲究，格式要做到与原件一模一样。为了避免浪费纸张，还需先把样本做出来进行打印，再对照原件仔细检查间距等方面的参数，定好模板后就可以开始录入数



/ 部分同学录、通讯录复制资料。

据了。待整本同学录打印完，最后进行手工穿孔、装订，一本完整的同学录才算制作完成。完成后，还要反复翻看核对，避免出现差错。

截至目前，黄成涯共搜集到同学录、通讯录等原件扫描件近 50 本，其中包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2 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9 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12 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13 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21 期同学录，还有庐山暑期训练团第 1 期警政组暨第 7、8 中队官员通讯录，陆军步兵学校将官研究班 5 期通讯录，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美国驻印中缅陆军军官战术学校、远征军 208 师通讯录等资料。这些同学录、通讯录主要记录了军校当时任职的校领导、行政教官、军事教官情况，记载了学员入校时间、毕业时间、姓名、年龄、籍贯、出身、通讯



/ 吴坤坤向玉林市档案馆捐赠黄埔军校同学录资料。

处等信息，是开展黄埔军校各级领导、教官、学员等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各个时期的黄埔师生，为中国革命、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通过这些文献，能增加对黄埔军校的直观认知，也能构建起关于黄埔精神的认识。此外，黄埔军校史料对于深入研究相关人物

的政治理念或军事教育思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来，这些复制的同学录、通讯录资料陆续捐赠给湖南省怀化市档案馆、广西柳州市档案馆和来宾市档案馆等多家档案馆。

在和黄成涯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得知，随着黄埔军校研究

的日渐升温，许多研究课题已经涉及到黄埔军校的各个不同侧面。每项研究都需要通过原始文献寻找依据、获得答案，专家学者们对黄埔军校史料的需求越来越广泛，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使用原始资料，通过深度挖掘这些史料的价值，取得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便在相应科研领域有所突破。

在感受到黄成涯收集、复制黄埔史料的意义之后，我深受鼓舞。在得到黄成涯同意后，我怀着极大热情，在工作之余联系了南京市档案馆、百色市档案馆、玉林市档案馆、贵港市档案馆及桂平市档案馆等，向档案馆捐赠了15套黄埔军校同学录复制史料。如今，我正在联系国内的多家档案馆，希望能及时补充各地档案馆对黄埔军校同学录的需求，助力专家学者和黄埔后代亲属对黄埔军校历史的研究。通过这段时间的搜集和捐赠工作，我深切感受到这项工作对加强黄埔军校史料的开发利用，促进黄埔军校史、中国军事史以及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还要继续积极深入到民间去发掘更多黄埔史料，同时加强整理、保护、传播工作，通过档案馆等机构将



/ 吴坤坤向贵港市档案馆捐赠黄埔军校同学录资料。

黄埔史料更大范围、更便捷、更高效地为社会各界所用，为黄埔文史研究提供更好的文献保障。

黄埔军校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台湾许多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人士都与黄埔军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黄埔军校史料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加强黄埔军校史料的研究和利用，大力宣传黄埔师生为国家 and 民族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对于增进海峡两岸的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黄埔精神是黄埔前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作为黄埔后人，我们既要代代守护黄埔精神，使其薪火相传，更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地弘扬黄埔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我们要继续以黄埔情缘为纽带，发挥独特优势，利用黄埔小史料，传承黄埔大精神，并将黄埔精神转化为推动祖国统一的实际行动，积极推进两岸各界同胞的交流交往，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寻找黄埔三期生蒋作舟烈士的故事

□ 蒋国雄

蒋作舟（1904—1927），原名蒋传明，黄埔军校第3期政治科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3师军需主任。后随军南进，途经会昌时，遭敌11个团阻击。8月24日，该师受命向会昌城北大柏山守敌发起进攻，蒋作舟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我是蒋作舟烈士的侄孙。2023年11月中旬，我收到了湖北省应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好消息：蒋作舟的烈士身份已确认，并被录入《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同时，蒋作舟烈士的名字被刻录在湖北应城市杨岭镇汤池的鄂中烈士纪念馆烈士英名录墙上。我历时两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实现了我家祖孙三代人寻找蒋作舟烈士的梦想。

身世之谜

在我小时候，就常听爷爷和父亲讲起我有个伯爷爷蒋传明是黄埔军校学生，后闹革命不知去向，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



/ 蒋作舟。

下落。2022年4月，应城政协文史委陶兴林和陈普明两位委员给了我父亲一张来自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作舟黄埔军校登记照片和存有照片的光盘，从此我开始多方面找寻资料，探寻他的革命历程，并开始进行蒋作舟烈士身份的确认工作。

蒋作舟在黄埔军校留下的通讯地址是湖北应城黄滩团刘永茂油坊，我从这个地址入手展开调查。当初，蒋作舟在黄埔军校留下的地址为什么是湖

北应城黄滩团刘永茂油坊？刘永茂又是他什么人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找到了当地的蒋氏族谱和刘氏族谱。通过查找蒋氏族谱及在当地的调查我了解到，蒋作舟原名蒋传明，1904年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天鹅乡蒋家台，父亲名叫蒋可根，母亲刘氏，蒋传明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我爷爷辈的老人讲，蒋传明自幼丧母，家境贫寒，由于老家蒋家台为湖区，这一年发大水家宅被毁，随父亲住弯子西边庙屋多年。蒋传明的舅舅在黄滩团开油坊，家庭条件较好，于是在舅舅资助下在黄滩镇上读书。他19岁时娶应城黄滩艾氏为妻，后妻子难产母子双亡。蒋传明在考入黄埔军校时改名为蒋作舟，所以我们家三代人寻找蒋传明90多年无结果。在黄滩镇镇长韩志斌和黄滩镇刘冲湾刘杏春村支部书记的帮助下，查找到黄滩镇刘氏族谱，了解到有关刘永茂油坊的情况。据村支书介绍，刘永茂油坊是黄滩镇刘冲湾刘炳如开办的，取名为刘永茂油坊，

通过油坊年份和刘炳如、蒋作舟的年龄分析，刘炳如是蒋作舟的舅舅。因为蒋作舟家在湖区，通讯和邮寄极为不便，所以他在考入黄埔军校后，登记的通讯地址为舅舅刘炳如的黄滩团刘永茂油坊。由此蒋作舟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

黄埔军旅

1924年，蒋作舟在妻子艾氏难产母子双亡后，经人介绍去了应城石膏矿打工。1925年在族亲蒋作宾的推荐下，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政治科学习，学习期间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作舟毕业后留校任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教官和区队长。庆幸的是黄埔4期生文强在其黄埔军校回忆录中有三段文字提到了蒋作舟，让我们了解了蒋作舟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军旅生活的点滴情况。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大叫一声滚！我走出了队长室，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

……幸好区队长中有一位左派分子名蒋作舟（此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暗中维护，假如没有他的苦心维护，是发现不了这个放暗箭者的（指右派分子李安定）。

……我记得蒋作舟区队长向我谈过，他说周主任的讲演最能感动人，连李安定每次都必到静听，听后还找学生中笔记记得好的去抄录起来。

革命生涯

蒋作舟离开黄埔军校后去了哪里？又是如何参加南昌起义的呢？我查询了陈予欢所著《黄埔将帅录》、曾庆榴所著《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贺龙年谱》等书籍，终于了解到蒋作舟参加北伐、南昌起义、会昌战斗的革命历程。在陈予欢的《黄埔将帅录》中查到，蒋作舟黄埔军校毕业、任4期教官后，于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政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据《贺龙年谱》1926年和1927年记载，1926年8月，周逸群带领蒋作舟、郭德昭等30名黄埔军校共产党员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宣传队进入湘西，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和独立第15师开展政治教导工作，为把贺龙的部队改造成

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并参加南昌起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蒋作舟后随贺龙部队一起北伐至开封、郑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贺龙部回师保卫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7月，蒋作舟随部队开到鄂城、黄石港、九江和南昌。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第3师（师长周逸群）军需主任。1927年8月30日，在会昌战斗中，第3师受命担任左翼，向会昌城北大柏山守敌发起进攻，蒋作舟亲临第6团（团长傅维钰）参加战斗，不幸头部中弹牺牲。会昌战斗中牺牲的团级军官还有第3师经理处处长郭德昭，他二人牺牲的经过在《贺龙年谱（1927年）》和李奇中的回忆录《会昌城边》都有记载和描述。

告慰英灵

1927年蒋作舟在会昌战斗中牺牲距今已90余年。2023年初，我与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肖燕燕主任和江西会昌县原党史办曹树强主任多次联系，了解蒋作舟的烈士身份确认情况，并在他们的指导下，于2023年9月开始收集蒋作舟的相关资料。我购买了民政部汇编的《中华英烈大辞典》等

从湘军将领到黄埔军校代校长的方鼎英

□ 李在全

1926年2月28日，方鼎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4月19日兼代军校教育长。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举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出师北伐。7月26日，蒋介石发表留别黄埔军校全体官长学生书，说道：“本校出征以后，校长职务已委任方教育长代行，各官长学生务必一致服从方教育长命令，即与服从本校长之命令无异。”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黄埔军校校务由方鼎英负责，方鼎英成为军校代理校长。众所周知，蒋介石由黄埔练兵起家，他视黄埔军校为自己命脉所在，为何将代理校长之位给方鼎英呢？

方鼎英，何许人也？

方鼎英（1888—1976），字伯雄，号同春，湖南省新化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母亲龚氏抚养长大。童年时随其堂兄学习四书五经，参加过童子试。时值清末，甲午战争战败、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不聊生，民族主义思潮勃兴，少年方鼎英深受影响，立志反清救国。1900年，他考入湖南实业学堂学习。1902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命令，各校选举学生50名赴日本留学，方鼎英由实业学堂选送参加考试被录取，旋即赴日本留学。他初入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学科，不久迁到神田区，在新化



/ 方鼎英。

同乡会事务所与陈天华（《警示钟》作者）同住，后由陈天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由于反清革命必须依靠武装力量，1905年，方鼎英考入日本

（接前页）

书籍，南下广州到广东省档案馆获取蒋作舟在黄埔军校的资料，从曾庆榴所著《共产党人和黄埔军校》一书中找到关于蒋作舟共产党员身份和蒋作舟1945

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的资料及证明材料。2023年10月，我向蒋作舟出生地湖北省应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烈士确认申请，湖

北省应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完成了审核审批流程后，迅速确认了蒋作舟的烈士身份。由此，蒋作舟烈士身份终得确认，烈士英灵终得告慰。■

的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毕业于，在国府台野战炮兵（日本陆军下属）第16联队入伍，为士官候补生。1909年，方鼎英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8期炮兵科学习，后来参加同盟会的小组“求知社”，与蔡锷、唐继尧、宋教仁等为同志。

1911年春，方鼎英毕业回国，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入伍生总队任炮兵教官。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南下到汉阳起义军炮兵司令部工作，后在湖南岳阳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处处长兼教练科科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方鼎英调陆军部任科员，编纂陆军炮兵操典射击教范及军士、兵卒等教科书籍。3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任大总统，排斥国民党人，实行集权统治，方鼎英参与蔡锷等人发起的反袁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次年方鼎英再度赴日留学，在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普通科、高等科各学习1年，又到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学习1年，之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做了1年研究。由此，方鼎英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高级军事人才。

1921年春，应湖南都督赵恒惕等人联名邀请，方鼎英回

国，担任湖南陆军第1师参谋长。这时期，全国范围的联省自治运动兴起。作为自治模范省份的湖南，应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湖北之请，出兵援鄂，方鼎英担任援鄂总指挥部参谋长。援鄂战争起始阶段进展顺利，不久吴佩孚率军南下，援鄂湘军溃败，赵恒惕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方鼎英只得南返长沙。此后，赵恒惕逐渐投靠吴佩孚。1922年，由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派遣，方鼎英赴日本观察秋操，归途经过上海，与谭延闿（民国初年三次出任湖南都督，在湖南有着巨大影响力）晤谈。方鼎英告诉谭延闿，赵恒惕已经降吴佩孚，无可救药，非由广东方面来根本解决不可。他还劝谭跟随孙中山革命，等待时机，解决湖南政局问题。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离开广东，来到上海。借此机会，谭延闿与孙中山往来密切。

1923年初，借助滇军和桂军力量，孙中山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南下广州，谭延闿随行。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大本营，重建广东革命基地，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广东各军，综理政务，同时确立联俄联共政策，推进国

民党改组，广东各项革命工作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上半年，湖南内部矛盾激化，赵恒惕与反赵势力之间爆发战争。7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出兵湖南讨伐赵恒惕。谭延闿奉令由广州出发，抵达湘南重镇衡阳组织讨贼军，任命宋鹤庚为讨贼军第1军军长、鲁涤平为讨贼军第2军军长、谢国光为讨贼军第3军军长、吴剑学为讨贼军第4军军长。军长宋鹤庚未就职，委任方鼎英代行军长之职。方鼎英赴衡阳，与谭延闿商谈，率第1军各部转战各地，并策动赵恒惕所部朱耀华团奇袭长沙，赵恒惕逃走，谭部人马攻占长沙。赵恒惕很快得到吴佩孚支援，卷土重来，重新占领长沙，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广东军情紧急，11月下旬，原本退居粤东的陈炯明部围攻广州，并勾结江西军阀方本仁攻广东的北江地区。在这危急时刻，孙中山急命谭延闿南撤，率部驰解广州之围，入湘讨赵之役中止。在部队南撤入粤途中，方鼎英率部阻击方本仁部，并收降赣军第9旅高凤桂部，受到孙中山嘉奖。由于湘军南下参战，很快解除了广州之围。战后，方鼎英担任驻粤湘军第1

军代理军长兼第1师师长。

1924年春，孙中山命令谭延闿所部湘军参与东征，讨伐盘踞粤东的陈炯明部。由于滇军、粤军配合不佳，加上湘军南来广东不久，水土不服，瘟疫流行，病死者过半，此次东征未达目的。9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率领驻粤各军由江西北进，这时方鼎英卧病于广州，未随军出征。在部队北进途中，方本仁一退再退，引诱北伐军进入江西吉安时突然反击，北伐军伤亡惨重，陷入困境。方鼎英闻讯后，抱病赶赴前方，见到谭延闿并献策：成立“湘军整理处”，整编部队，以团为单位组编。谭延闿任“湘军整理处”总监，各军长任副总监，方鼎英任副监。另设湘军讲武堂一所，以陈嘉佑为堂长，方鼎英兼任教育长。经过整编，谭延闿所部湘军编成7个团，军容整肃，焕然一新。

这时期，方鼎英身体并未完全康复，他所部第1师，约有5000支枪、上万人，由原来的第1军军长宋鹤庚率领，宋鹤庚受赵恒惕引诱，带领部队驻守湘粤边区汝城县，因与滇军不睦，处在滇军与赵恒惕军的夹击之下，进退两难，多次

【版一第】

（一期星） 日五十月一十年五十國民華中（紙聞

第五期同學訓話

方教育長鼎英

今天是我校第五期開學，各校長大半原是在校服務的，學生則由本校入伍生升學的，對於本校創辦的意義和歷史，都已有了相當的認識和訓練，毋庸再來細說，不過有幾點應該注意牢牢記着的事項，分別講說於次：

第一。各同學之來本校入學，自然是遵信三民主義爲着革命而來，決不是爲升官發財而來幹投機事業的。所以在校求學的時期，就應該秉着犧牲的精神，強固的意志，時時刻刻切實鍛鍊自己的心身，研求相當的學識，以備向革命程途前進。犧牲一己的利益，以謀人民的幸福，犧牲一己的生命，以謀國家的生存，如是諸同學方不枉入了黃埔，方不算虛費了光陰及辜負了入學的初願。

第二。本校是建設在黨上面的，黨與校是相聯不可分離的一個大團體，在校固要遵守軍紀，尤要遵守黨紀，軍紀黨紀是相輔相需缺一不可的，不能在軍而蔑視黨紀，亦不能在黨而毀壞軍紀。

第三。革命的歸宿，是爲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即是爲求民衆最大多數的自由平等，不是爲一個人或一小團體及一階級的，大凡一般的人們，最先忘不了的，就是個人的「我」進而擴充到一小團體或一階級，一說到自由，每每僅只顧及了自己

/ 方鼎英在第5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派代表来请方鼎英前往领导。适值北方的国民军第2军司令岳维峻自河南来电，约谭延闿再度出师北伐，会师武汉。多方权衡后，广州大本营委任方鼎英为“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方鼎英的计划是：由广州大本营总参谋长方声涛致函赵恒惕，请赵允许方鼎英率部假道湘西，会同在湘西的熊克武部川军、蔡锷部一起参与北伐，与岳维峻会师武汉；作为交换，把湘西数十县的地盘交给赵恒惕。但这个计划并未成功，方鼎英部队也被收编，他只能赴长沙见赵恒惕，但相谈无果。方鼎英离开长沙，前往武汉。

1925年春，方鼎英在汉

口养病，谭延闿多次来电催促他回粤。方鼎英也注意观察南北时局，几番思量后，决定南下赴粤。9月，方鼎英抵达广州（这时孙中山、廖仲恺已经逝世），见到谭延闿。谭告诉他：“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要你去帮忙办理军校，此事本来孙中山在世时已经派廖仲恺前来接洽过，那时因为你在湘军带有部队，不能抽身，所以没告诉你。”但方鼎英没有立即到黄埔军校。当时驻扎广东的各支军队，基本都创办自己的军校，谭延闿所部湘军就办有讲武堂，方鼎英以湘军整理处副监名义帮忙。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革命形势高涨，

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奔赴广东。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原来各军所办的军校全部并入黄埔军校，改组设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归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邵力子任政治部主任。军校管理机构也相应改组和扩大，除政治、教授、训练三个部仍旧外，军医部改为军医处，管理部改为管理处，另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辑处、高级班、兵器研究处等五部五处一班。在各部、处之下分别设立俱乐部、印刷所、医院、疗养所、军械库、监狱等40多个附属机构，配合校务工作的全面发展。学员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军事教导队五大类。

黄埔军校改组的同时，由各地招考而来的第4期学生陆续入校，有两千多人。从第4期起，军校为了加强入伍生工作，新设立“入伍生部”专职管理，方鼎英担任入伍生部部长。

学生人数骤增，带来一些问题。方鼎英后来指出，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的不足之处是

程度参差不齐，因为该期学生是由各省考试及各军校招考合并而来，各地、各校掌握的尺度不同，学生入校以前未经严格的选验，也没有经过完全的入伍生教育。

方鼎英筹组的入伍生部分秘书、总务、军事、政治、外语诸科，每科职员三五人至十余人不等。因学生程度不齐，特设普通科学课，安排教员较多。方鼎英担任入伍生部部长后，对于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普通科学补习等问题，经常与有关教职员研究讨论，制定计划，再结合学生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他还经常观看学生操练，去课堂听课，随时检查学生开会讨论与内务整顿等情况，也经常与政治部主任对学生作精神讲话、传授革命思想。

有学生回忆方鼎英在黄埔军校的工作情况，“方鼎英外貌魁伟，精神奕奕，颇具才气，是本土官学校、帝国大学造兵科学生”，他是“职业军事家，涉及政治圈子不深”，“为人忠厚、和蔼，对年轻的后生好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发挥业务专长，译、校兵学书籍，审订计划、教程，督导组织训练，确是军事上的内行里手”。可见，方鼎英对军

校工作认真负责，也深受学生爱戴。当然，军校的入伍生工作也有一些遗憾，后来方鼎英也说道：“由于条件所限，学生本应编入正式部队，与士兵一同授予军事训练，这样才能懂得训练部队的真实意义；由于没有步、马、炮、工、辎各不同兵种的组织与训练，不能使学生对各兵种的训练一一去实际领悟，只能一律授予步兵的训练。”

方鼎英担任入伍生部部长不久，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6年4月，方鼎英受命代教育长，仍兼入伍生部部长，接办军校第3期学生毕业分配及第4期学生升学工作。在代理教育长期间，方鼎英利用其在军事学界的地位，广揽军事教育人才，依靠共产党人，积极进行校政建设。他编纂军事典范令及有关教材，使军官教育水平与学生学习能力得到提升。他还编纂文集，主持编纂黄埔丛书。方鼎英本人在军校的讲演，后来汇编成《方教育长言论集》出版。

这时期，黄埔军校的校舍房屋不够，除校本部几栋旧房能供一部分住宿及作课堂与自习室外，大部分学生是按步、

骑、炮、工、辎、政治各科分编成队，散驻蝴蝶岗等地。学生宿舍，仍搭草棚，做竹架层铺，操场上的讲台及来宾休息台，也是竹架的草棚。每星期一，集合员生做纪念周讲话，逢节日请来宾前来讲演，都在此处，雨天则在大礼堂举行。这时的黄埔军校，由于人才日益集中，教学各方面均成绩卓著，声誉较前更高。军校的经费也由第3期以前的每月二三十万元，增加到每月百数十万元，但仍感不敷支配。

1926年上半年，随着北方形势的变化，出兵北伐提上广州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6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兵北伐。这时方鼎英请求辞去军校职务，回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即谭延闿所部湘军）参加北伐，未获允许。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迅速推进，1926年10月攻克武汉。不及半年，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1927年3、4月，相继占领江浙上海等地。这段时期，方鼎英负责军校校务，工作繁忙：第4期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部队参加北伐；不久，第5期入伍结业，继续升学；第6期入伍。对此，方

鼎英晚年感慨道：“实吾煞费苦心，最伤脑筋的时代。”

随着北伐战争迅速推进，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日益激化。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旋即留守广东的李济深等人也开始“清党”。命方鼎英邀留守总部，并向他出示“清党”密令，说黄埔军校是广州共产党的大本营，责令他负责清除在军校的全部共产党员。方鼎英力主“和平清党”，并要求假以时日。在李济深的允诺下，方鼎英回到军校，与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熊雄商谈，私下告知广州要逮捕共产党人，寻求应对事变的妥善办法。同时，方鼎英赠送路费，劝熊雄赶快离开广州。在方鼎英主持和安排下，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师生以“自动请假”名义离校，三天之后，军校才公开组织“清党委员会”办理清党事宜。方鼎英的温和做法，保护了一批革命力量。但是，反共的右派分子，对黄埔学生乱捕滥杀，还控告方鼎英庇护共产党员，方愤然离职。9月，方鼎英调任新编第13军军长。至此，方鼎英离开了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方鼎英为这所闻名世界的军校作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黄埔学生晚年都惦念着这位忠厚、和蔼、业务专精的师长。

1928年，方鼎英率部抵达南京，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46军，参与二期北伐战争。此后，方鼎英被蒋介石绑在与各地方实力派混战的战车上，东奔西走。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组建抗日反蒋政府，方鼎英参与其事。不久，他赴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方鼎英由香港返回抗日前线。1938年，担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抗战胜利后，他退居湖南，赋闲在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鼎英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司法厅厅长，湖南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晚年，方鼎英写下了不少忆述文字，包括创办黄埔军校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1976年6月，方鼎英病逝于长沙，终年88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从淞沪会战到台湾光复

——陈颐鼎将军往事回忆

(上)

□ 陈万中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成果，台湾光复是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法理依据，也是海峡两岸同胞、海外侨胞共同的历史记忆。

我的父亲陈颐鼎是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抗战期间，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他遗留的淞沪会战亲历手稿及率军光复台湾的点点笔墨，记录了他经历的那段悲壮历史，质朴无华，言之娓娓，伤逝幽怀，沉忱至深。天下滔滔，八秩弹指，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世间万物力过则穷，智过则止，壮过则老，自古如斯，唯文字能传世耳。这就是我根据父亲的手稿重新回顾父亲这段历史的拳拳私心、殷殷之情也。

1936年日军在华北蠢蠢欲动，国民革命军第87师整理为两旅四团制，另配备师直辖骑兵、特务连各一连，炮兵、工



/ 任第87师第261旅旅长的陈颐鼎。

兵、通信兵、辎重各一营，总兵力达1.2万余人，武器装备都是德式。我父亲陈颐鼎时任第87师第261旅第521团上校团长。1937年8月12日，第87师、第88师、第36师在京沪国防区总司令张治中率领下进入上海。父亲带领的第87师第521团到达上海吴淞镇炮台湾地区待命。当天下午，第87师师长王敬久来到吴淞镇，父亲陪同王敬久师长去炮台湾视察，

此时炮台湾的炮台按照1932年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早已拆除，残留的炮台基座深藏于荒草之中。时值黄昏，吴淞口与汇山码头之间的日军战舰来回逡巡，映照在夕阳的余晖里，父亲激愤地说：“如炮台还在，无论如何日舰绝不敢在要塞前如此放肆！”王敬久感慨道：“国人受人凌辱到如此地步，我们军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次民族大决战，正是我辈军人报仇雪耻的时刻，为国家牺牲要从我们自身做起。”

8月13日晨至下午3时许，父亲听到江湾方向炮声大作，日海军陆战队大炮向第88师八字桥阵地轰击。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逡巡在黄浦江面的日舰向吴淞镇猛烈炮击，吴淞镇及同济大学霎时陷入一片火海。8月16日夜，第61师开到吴淞地区接收第521团防务。父亲带领第521团旋即集中到新市区第87师师部叶家花园附近，受命加入突击队，



/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里的雕塑。

向北四川路日军心脏地区进攻。17日拂晓，突击行动开始，父亲挥枪前进。突击队按命令遇隙突入，志不在攻坚，遇到日军火力封锁则穿墙破壁或在房顶上架设竹梯通过，力求隐蔽地以持续不断的推进来破坏敌军阵地的稳定。上午9时，突击队攻克日军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全歼守卫在这里的日军。这次围歼行动成功，全凭战前准备充分，实地侦察后精心制作了详细的军事地图，标示清楚了这些据点位置。王敬久还要求拿下据点后及时上交该处门牌以便确认。下午5时，日军组织两次激烈反攻，均被突击队击退。父亲他们当天打下十

余座日军地堡，致使其余日军龟缩在较大的坚固地堡内不敢露头。18日，突击队对公大纱厂发动进攻。日军在这里构筑了几十个相对独立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每个堡垒的枪眼特别小，虽然自身视野因此受到极大限制，但视野死角处有相邻地堡交叉支援，这样在小范围内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防御体系。突击队无法从正面攻击，又难以实施迂回，加上没有攻坚武器，根本“啃”不动这些坚固的堡垒。父亲率领突击队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但未能占领日军钢筋水泥的楼房据点。突击队的炮兵发射了密集的小炮弹，火力异常猛烈，步兵亦

极勇猛，但还是挡不住黄浦江上日舰炮火的轰炸，更奈何不了日军在街市上坚固的地堡，所以突击队虽攻入码头，但几乎看不到一个日军，更糟糕的是还没找到日军工事，突击队人员就被日军隐蔽火力给撂倒了。这让突击队有劲也无处使，只有第521团1营营长周鉴带领士兵烧毁了日军仓库一座。18日夜，突击队接到命令，被迫撤出战斗。19日，第36师风尘仆仆赶到上海，连夜从正面再一次向汇山码头发动进攻，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第521团撤出战斗后，转移到蕴藻浜车站西侧的黑桥宅、陆家桥宅至蕴藻浜一线设防。8

月26日，父亲接到命令，要不顾一切牺牲夺回失守的张华浜车站，阻击登陆之日军。张华浜车站里躺着被炸毁的储油罐，罐里的石油流到哪，火就烧到哪。酷热的天气加上大火的高温让父亲身上每个毛孔都从里往外冒着汗水，军服湿哒哒地沾在身上，把身体裹得紧紧的。是夜，将士们利用黑暗与石油燃烧产生的浓烟这道天然屏障掩护，尽可能地靠近日军阵地，力求能够在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内发动突击。随着手榴弹呼啸着飞向日军阵地，日军像镰刀下的草一样成排地倒下。争夺张华浜车站的战斗异常激烈，黎明时分，第261旅夺回了张华浜车站的控制权。

8月30日，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其中一部向黑桥宅第521团扑来，日军的目的是与龟缩在市区的日海军陆战队会合。黑桥宅属于日军海军舰队炮火控制区域，距日军登陆处只有2000米左右。该处河面上有一座大木桥，是日军必经之处，为吸引并杀伤登陆日军，中国守军没有采取炸毁大桥阻止日军增援的措施。当日军采用不顾伤亡的“万岁突击”向第521团阵地强行冲锋时，第521团集中十几挺重机枪及

其他武器向日军开火，日军纷纷被击中掉入河中，战斗之激烈达到白炽化程度。父亲冲出指挥所，亲自用机枪扫射，以振奋官兵士气。不幸的是他在投掷手榴弹挥臂的一刹那，手腕被子弹击中，留下个血窟窿，戴的手表也被击飞了。但这时候官兵们的枪管打红了、嗓子喊哑了，父亲明白此时拼的就是意志，为此他没有下火线。一天苦战下来，前线将士早已死伤枕藉、疲惫不堪，但仍然不敢放松，因为黑夜有可能是另一场艰巨战斗的开始。父亲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和日军交过手，已经熟悉日军的作战习惯与心理，知道日军一定会发动夜袭。为防日军夜袭，将士都夜不解甲，相互背靠背地在战壕里休息，疲惫之极的他们快速入眠。天气酷热，将士随身携带的水早已喝完，第521团在战场上的处境只能用“苦”和“难”两个字来形容。晚间，天边刮来片片乌云，轰隆隆的雷声响过之后，“哗哗”地下了一场大暴雨，天气这才稍稍凉快起来。不出父亲所料，日军果然来夜袭，观察哨发现在夜色掩护下的日军正蹑手蹑脚地向第521团阵地摸来。夜色也掩护着第521团的将士们，

他们不声不响地潜伏着。日军已经进入火力控制范围，父亲沉住气，近点、再近点，“打！”一声枪响，521团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日军猝不及防，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惨叫声，但后继者依旧蜂拥而上，机枪的吼叫在持续，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味。渐渐地，机枪声平缓下来，父亲巡视阵地隐隐嗅到阵阵酒气，同时在日军尸体上所携带的水壶中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第521团在黑桥宅坚守了整整13天，迫使日军不能前进一步，但自身也伤亡惨重。

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8月23日，日军从川沙口、狮子林等地登陆，有3个联队向罗店发动奇袭。日军惯用的战术有奇袭、夜战和迂回。8月28日，罗店失守。罗店虽是一个小镇，却是通往宝山、上海市区、嘉定等几条公路的交通枢纽所在地，位置相当重要。于是，左翼军总司令陈诚调集第11师、第14师、第98师、第67师展开罗店争夺战，罗店阵地曾八次易手，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9月30日，日军改变了登陆后主力一直在蕴藻浜北岸向西进攻的路线，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把目光投向了蕴藻浜南岸的大场。大场南

临闸北，闸北的战事正胶着，北面是蕴藻浜可通向杨行、罗店，西面是南翔、嘉定，大场就是淞沪战场的中心圆点。从这里可以辐射到淞沪战场的各个据点，大场也是阻止登陆日军与被围困在市区的日海军陆战队会师的战略要地，占领大场就可以将中国军队劈成两半，使其左翼右翼两军不能相互联络。松井石根决心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调集了第9师团、第3师团、第101师团由西向东对大场形成马蹄形包围圈。日军强渡蕴藻浜，兵锋直指大场。大战在即，第87师第26旅旅长刘安祺调任第61师副师长，其261旅旅长遗缺由父亲接任。当父亲接过第261旅的关防时，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更希望得到兵源补充，而不是一个头衔。

10月，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强渡蕴藻浜得手，大场方面吃紧。第87师奉命增援，防守在大场正东面。大场战役中日双方采用的都是“添油”战术，攻守双方不断增兵，战况越打越激烈，规模也越打越大，气氛异常紧张。日军的进攻越来越疯狂，在主要冲锋线上都有坦克配合作战，各部轮番发起突击，前面日军旗手刚刚倒

下，后面的士兵就接过旗帜继续向前，这就是日军的“无脑冲锋”，这时决定胜负的已不是战术，而是意志！父亲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晚，上级派江苏省的以孙天放为团长的一个保安团补充第261旅，我刚将保安团集合在一片竹林里向他们介绍战场情况，话音未落，即闻大场正东阵地被敌突破，情况紧急，我下令该团立即投入战斗，向敌军左侧背突击，该团官兵奋勇争先，几经肉搏，终于夺回阵地，战后点检该团，幸存官兵不到500人，他们作战之勇，牺牲之壮烈，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江苏省保安团建制2000多人，一夜之间基本上拼光。人称罗店是“血肉磨坊”，那大场就是“绞肉机”。第261旅刚刚恢复原阵地，但日军根本不给喘息之机，日军敢死队又敲响了进攻的鼓声。松井石根集中了3个师团所有兵力，在强大的炮兵、坦克兵以及空军的协同下，发动全线总攻。当天，日军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炮弹“呼呼”地飞向中国守军阵地。隆隆炮声中，大场一片火海，巨大的烟柱和滚滚灰尘直

冲云霄。冯玉祥这样形容日军的这次炮击：

海舰空机，昼夜轰击，震惊万日之射落，夜见繁星之雨陨，蚩尤之雾，不啻千里雷霆之震，且越百里，我军以少敌众，以弱敌强，以苦械当利兵，以饥饿当饱逸，然犹奋不顾身，必死为期者。国之存亡，决诸此役也。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

轰炸后，日军判断大场已无生物，他们可以排着队大踏步地走进大场。然而他们错了，中国守军从废墟中爬起、从弹坑中跃出，他们分散出击，不干倒几个日本兵，绝不收手。面对日军的坦克，第261旅士兵们怀抱炸药包静伏等待，当双方接近时，战士们一跃而起，将炸药包扔过去，一辆辆坦克被摧毁。双方互相厮杀，甚至展开肉搏。这样持续了3天，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后，日军终于在大场北面庙行至陈行之间撕开了中国守军的防线，蜂拥而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兰州军区司令员黎原将军（黄埔军校11期生）晚年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 2025年11月17日，作者（右二）和黄埔后裔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合影。

我当时是第87师师部的一个传令兵，师长王敬久让我将撤退命令送达给第261旅旅长陈颐鼎。命令传到后，陈颐鼎旅长根据当时战场实际情况，第261旅一旦撤出战斗，其左翼的湘军朱耀华的第18师，立即就有被日军包围歼灭的危险，陈颐鼎没有执行上级撤退命令，顽强地坚持下来，掩护朱耀华的第18师顺利撤退，这是一名军人在战场上的可贵的精神素养。陈旅长得到师长王敬久通令嘉奖。

10月26日，大场失守，市区的闸北随之陷落，日军登陆部队与困守在市区的海军陆战队会合。第87师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北新泾为中心重新布防，阻止日军南渡苏州河，战斗还将继续！

“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是兵家名言。上海的地形地貌决定它有很多个包抄迂回点，松井石根的眼睛望向了杭州湾，这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金山卫”——松井石根死死盯住这个地方，这里有大片平坦的沙滩地，水深仅有40尺，不利于登陆舰直接登陆，绝非登陆的良地。“是的，绝非登陆良地”，唐生智、冯玉祥、朱培德等国民政府智囊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这里布置的兵力较弱，但松井石根这一次反其道而行。11月5日，日军10万大军在80架飞机、百余门大炮进行了2个小时的轰击后，分头于金山卫到平湖全公亭沿岸数公里范围内大举登陆。中方当时在金山卫的守军只有两个连加上一个地方保安

中队，日军强大的火力将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成功登陆的日军随即兵分三路，一路直扑松江、一路北上闵行、一路杀向嘉兴。这时，中方在战术上完全输了，守军腹背受敌，有被歼灭的危险。最终，父亲预判的吴（苏州）福（常熟县福山镇）防御线上必有一战也没能实现。原来，由于日军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白茆口成功登陆，导致国家花了巨资，第87师、第88师辛辛苦苦构筑的吴（苏州）福（常熟县福山镇）线防御阵地根本没有利用起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于是门户大开。11月8日，蒋介石无奈下达了全面撤退命令。当父亲把继续撤退的命令向下传达时，第261旅官兵莫不失声痛哭。由于战局恶化太快，中国军队的撤退陷入混乱。父亲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关于撤退的描述：“一路上人喧马嘶，大家拥挤在一处，日军飞机一来，秩序大乱，建制也大乱，各部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营连排长失去了对所属官兵的掌握控制，真正一锅粥……途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公路横躺竖卧着百具士兵尸体，惨不忍睹！”11月13日，第87师一直退到了镇江。3个月的淞沪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记外公安维俊二三事

□ 白文宏

2024年的清明节，轮到我在单位值班，不能外出扫墓，但思绪犹如黄河岸边的杨絮柳绒随风飘飞，目光也不由自主定格在一本由民国三十一年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的《边疆调查报告之六：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以下称《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的线装书上。书是我在网上买的，有些残破，内容主要是民国时期以及民国之前河西走廊的民族变迁、风土人情和各民族文化交融情况，其中有三处记载了我外公安维俊年轻时的一些事迹。联想去年至今，我先后两次以黄埔后人身份参加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活动，还当选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五届理事，并被聘任为宣传专委会副主任。深感荣幸之余，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恰逢外公诞辰百年，想来还是写点文章为好，既是对外公的怀念，又是发扬传承黄埔精神的实践。

外公1925年出生，祖籍甘肃省肃南县明海乡，裕固族。194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



/ 安维俊。

分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19期，后在酒泉专区公安局工作。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外公主动申请到肃南县工作，任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后来调任县畜牧科（站）任科长（站长）。1958年因历史原因入狱，后来病逝。1980年平反，落实政策。

勤奋学习

关于外公的学习经历，《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有详细记载：“三十八年夏（1939年），立民（安立民）接受了本组（调查

组）同人之劝导，送其子安维岳、其侄维俊（即安维俊）等入河西中学附小，编入小学五年级（学习）。”

据桑耳湖安维财老人生前叙述，当时一同去酒泉上学的还有沙湾的白自智（笔者四爷），三人后来参加了干训团（即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一边疆青年训练班），又一同进入国立肃州师范学校学习，返乡时身穿马裤，脚蹬马靴，威风干练，十分潇洒，让明海的同龄青年特别羡慕。后来三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安维岳自国立肃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承袭部落头目职位。安维俊经推荐从国立肃州师范学校赴西安，在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19期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白自智患痢疾在家病逝。

外公是肃南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之一，更是正规、系统学习军事知识第一人。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举办结业典礼时，校方为成绩优异的学员颁发“中正剑”，外公也得了一柄。中

正剑剑长 50 公分，上面刻有“成功、成仁 安维俊佩”8 个字，但由于岁月侵蚀，加之保管不善，如今剑上的字迹已变得模糊。



/ 安维俊的中正剑。

资助兴学

外公的家乡在少数民族地区，民国时期由部落头目管辖族内和地方事务，只有少数喇嘛

基于诵经需要在寺院学习藏文，兼习汉文（其与近现代意义上的语文、算术和文史学习几无关联），普通牧民的子女基本没有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的平台，更无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机遇。为此，外公和“维岳（即安维岳）常劝其父（安立民，部落副头目）兴学”。“有此数因，在二十九年（1940 年）秋季，立民即微露兴学之意……是年五月，开联合董事会，决议设立学校”。外公积极捐资建校。

《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中还描述了学校设立前后的一些细节：“是年（1941 年）九月，校址落成，同时开学，余往贺之，两海子人士聚会，适维峻（安维俊）娶妇，置酒高会，每日开筵五度，入夜犹高歌侑酒。”婚宴

中，两海子上层人士还商议了筹办学校之事，两地的分歧也借酒宴冰释。学校于 1941 年秋季正式开始招生，多为本地少年，现有据可查的第一批学生共有 30 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主要服务于市县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以及宗教团体，成为在民族地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骨干力量。

抗日报国

西北虽远离战争烽火，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大量苏联援华战争物资通过陆路由新疆入境、再由酒泉转运至兰州，分发前线。缺乏交通工具是当时最大的困难。

外公的家族在当地是大户

人家，家境殷实。家里的牛羊和骆驼数量近千，能独家组建驼队，远赴兰州、迪化（乌鲁木齐）、包头等地贩运粮食、毛皮或其它生活用品。外公从西安分校毕业后，积极动员族人参与组建驼队，同时贡献自家驼队，远赴新疆驮运枪炮、弹药和汽车轮胎等军用物资，在酒泉

中转。他和他的乡邻、族人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奉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58 年，外公因历史原因入狱，后病逝。1980 年，外公得到平反，肃南县政府落实抚恤政策，安排舅舅和两个小姨在体制内单位工作，每月还给外婆发放生活补助，让她享受县域内干部家属待遇。

斯人已逝，其风尚在。新时代，我们黄埔后代要不忘黄埔使命，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的贺信精神，牢记习总书记对黄埔亲属的殷殷嘱托：“不忘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新北京人”刘元媛： 以青春之姿，架两岸中医文化之桥

□ 王丽



/ 刘元媛参加第五届台湾高校在京校友新春团圆会。

清晨的阳光透过国药孔医堂的窗棂，洒在一张古朴的木质诊桌上。诊桌旁，一位年轻的女医师正专注地为患者把脉，目光温和。这位来自高雄的医师刘元媛，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先用左手中指轻轻按住患者关脉，左手三指在寸、关、尺三部间游走，时而闭目沉思，时而轻声询问患者症状。她的声音柔和而清晰，像一股清泉缓缓流入患者心田。

从高雄到北京，追寻中医梦

刘元媛家族来自山东临沂，1949年迁往台湾定居。军人出身的父亲（陆军官校52期生）对后辈们要求十分严格，“牺牲、团结、负责”一直是家族的精神内核。刘元媛受父亲影响最大，“他常常鼓励我们三个女儿要有一技之长，不仅能帮助别人，更能成就自己”。

刘元媛从小就对中医十分

感兴趣，当时就想，学中医一定要去大陆啊！长大后的她经常上网搜索了解大陆高校在台湾招收中医专业学生的情况。父亲得知她的想法后，非常支持，并鼓励她勇敢去追求梦想。在父亲的鼓励下，带着对中医文化的热情和“来大陆学中医，感受最正宗的中医文化”的执着，刘元媛毅然踏上了大陆求学路。2014年，她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完本科学位后

在首都医科大学继续深造，成为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张捷主任的关门弟子。

初到北京，刘元媛面临诸多挑战，语言、饮食、气候的不同，再加上学校的高要求，都让她感到压力不小。但一次与中医的“亲密接触”，让她坚定了学习和传播中医文化的信念。来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刘元媛患上了重感冒，随身带的感冒药快喝完了还未见好转，在宿舍养病期间感到非常孤独。同宿舍的师姐亲自为她煎了一剂中药，叮嘱她按时喝。当晚喝完中药后，刘元媛在被窝里出了一身汗，第二天一早就满血复活了。刘元媛至今难忘：“那一刻我更加相信中医，不仅从医者角度、更从患者角度，我被中医治愈的那一刻，就是我和中医建立更深联结的时刻，同时我也坚定了留在北京学中医、从事中医问诊工作的决心。”

从此，刘元媛更加刻苦地研究中医理论，从经典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到复杂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方法，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中医的世界中。读书之余，刘元媛不忘从实践中学习。在学校期间，她常跟随老师参加各种义诊，观察老师如何通过“望闻问切”了解病



/ 刘元媛。

人情况，如何通过中药和针灸对患者进行调理。

在大陆扎根，以中医济世

刘元媛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在国药孔医堂和北京灵兰中医诊所执业，将所学运用到实际诊疗中，用中医智慧为患者解除病痛。

“您最近是不是经常感到乏力？睡眠怎么样？”刘元媛一边把脉，一边观察患者气色。患者是一位中年女性，脸色略显苍白，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刘元媛耐心听她诉说，不时点头表示理解，把脉结束后又仔细查看患者舌苔，然后拿起笔在病历本上飞快书写起来。“您

这是脾虚湿困，需要调理一下脾胃”，刘元媛边说边开出一张中药处方。“这些药物都是温和调理的，您按时服用，平时注意饮食和作息，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她的语气中充满了鼓励和信心，让患者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在大陆的中医学习经历，不仅让刘元媛掌握了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也让她深刻体会到中医“医病、医人、医心”的核心理念。在刘元媛看来，中医不仅是一种医学体系，更是一种生活哲学，“中医教会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何以平和心态面对生活起伏”。在刘元媛的诊室里，患者们不仅

得到身体上的治疗，更感受到心灵上的慰藉。她耐心倾听患者诉说，细致分析病情，为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她的医术和医德赢得了患者信赖和赞誉。“在台湾，大多数人认为中医是用来康复、调养、养生的；而在大陆，中医可以与西医并肩站在救治病人的一线，大多数患者也很认可中医。”刘元媛有个心愿，希望将两岸的中医优势结合起来，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以黄埔精神，传承中华传统医学

“我出生在军人世家，父亲是陆军军官，父母从小教育我们要懂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论身在何处，家庭成员之间都要团结一致，面对责任要勇敢承担，这就是黄埔精神的体现。”在202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在京理事亲属茶话会上，刘元媛发言时对大家说。

小时候的刘元媛，对父亲口中的黄埔精神总是一知半解，直到后来姐妹三人先后来到大陆学习、生活、工作，这才开始对黄埔精神有了不一样的体会。父母一直鼓励三姐妹在中医领域加强学习研究和实践，以黄埔精神传承发扬中华传统医学。为此，刘元媛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参与



刘元媛与父母合影。

两岸中医领域的交流活动。“我经常邀请台湾的中医师来大陆交流，他们带来了台湾的中医经验，我们也分享了大陆的中医成果，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学术上的进步，更增进了两岸同胞情感。”刘元媛每年都积极参与医药论坛，与来自台湾的健康专家分享经验，探讨西医新技术与中医结合，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刘元媛还担任“中医药进校园”讲师，为清华附小、北京四中等学校的孩子们讲授中医知识。她通过简单有趣的语言，向孩子们介绍中医基本理念，如阴阳五行、经络穴位等，她还带领孩

子们制作中药香囊、体验按摩，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医魅力。“孩子们对中医的好奇和热情，让我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希望。”

在刘元媛身上，我们看到了家国情怀与医者仁心的完美融合。刘元媛认为“中医是时间的低语，是历史的馈赠，更是两岸同根同源的见证”。她对未来充满期待：“我希望能够继续深耕中医领域，不断提升自己的医术和学识，同时我也愿做中医文化的传承者，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以青春的热情传播到两岸人民心中，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抗日战争昆仑关之役纪要

□ 苏维中

苏维中，江西省宜春市彬江镇苏家村人，1906年生，曾就读于宜春省立第七中学，高三毕业时，正值抗日军兴，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第8期，学习3年毕业后，历任国民党第87师排长，第5军200师机械化部队连长、营长。昆仑关大捷以功晋升团附，尔后奉命远征缅甸抗日，任第5军军部（军长杜聿明）中校特务营营长，第2团团附（师长戴安澜）。从缅甸回国后，历任空军航空混成旅少将旅长，陆军少将师长等职。后居台湾。

昆仑关战役，是华南抗日史上的一场大血战，消灭日寇一个师团，计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长驱直入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士气，真是可歌可泣！战役中，苏维中率部攻打具有关键性的六〇〇高地，并坚守数昼夜，粉碎敌人多次反扑，巩固了阵地，有力地配合友邻部队，为最后攻下昆仑关扫清了前进中的主要障碍。远征缅甸后，继续抗击日寇，浴血奋战，屡立战功。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立下功勋。现将袁尼卡（苏维中外孙）保存的这份史料，如实转载，以飨读者。

1939年冬，日军于湘北遭重创之后，采取大迂回战略，向我西南后方进犯，企图截断我西南之国际运输路线，绝我外援，并威胁我大后方川黔心脏地区，迫我屈服，于11月15日在钦州湾附近登陆，乘虚北向侵犯，于28日攻陷南宁，迄12月4日攻占南宁以北之昆仑关及其以西高峰隘之线。

我最高统帅部于日军向南宁侵犯之际，鉴于桂南战略地位之重要，紧急自各战区抽调部队向柳州附近集中，准备迎击。迄12月中旬概已于柳州以南完成战略展开，同时日军悬军深入，其攻势已趋后继乏力。于是，最高统帅部令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指挥夏威、徐庭瑶两集团军，反攻北犯之敌军。

徐庭瑶集团军担任中央正面的攻击任务，其所属第5军（军长杜聿明），是当时唯一号称机械化部队，原驻桂北全县东安附近，奉命后兼程向柳州前进，在柳州附近集结，当即沿南柳公路向

宾阳附近推进，准备夺取昆仑关。

侵犯桂南之敌系日军第5师团另配附台湾混成团，由于轻敌深入，此时其兵力已陷于分散，一部于南钦公路以东取攻势，企图确保其后方联络线，一部则向龙州侵犯。守备昆仑关之敌，为第5师团之第9旅团，辖有4个步兵联队，两个炮兵中队，一个战防炮中队，素以善守著称。

我第5军下辖戴安澜之200师，郑洞国之荣誉第1师，邱清泉之新22师，另配战车、汽车、工兵各一个团，重炮兵一个营。

第5军系利用夜暗行接敌运动，先头部队通过宾阳后，始遭遇敌地面部队之抵抗，及敌空军之侦察，乃以有力之一部驱逐敌警戒部队，主力随后逐次推进，展开于大球岭、大玫岭之线，向昆仑关之敌攻击。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方，距南宁约60公里，北距宾阳约30公里，为南柳公路必经之要隘，形

势相当险峻，其东西向绵亘起伏之高地，标高约300至700之间。敌军防御阵地系利用昆仑关及两旁各高地编成，具相互支援的据点式阵地。本地区系砂砾土质，虽不易构筑工事，但敌占已10天以上，故一般野战工事及人员掩蔽部均已完成，面对此种阵地之攻击，必须充分的支援火力，并行绵密的攻击准备，否则不易奏效。

地形上，在敌军阵地之各据点中，昆仑关北方之六〇〇高地，及其东侧之六五三高地，实居于关键性地位，而成为敌我两军必守必攻的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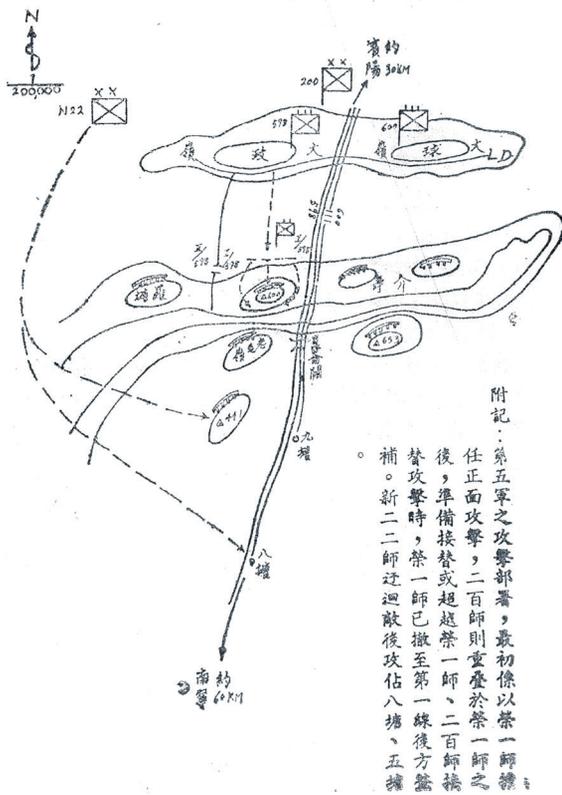
第5军攻击部署，沿公路指向昆仑关正面，系以荣1师与200师重叠，荣1师在前任主攻，200师随后跟进，准备接替攻击或扩张战果，新22师则由右方向敌后迂回。

荣1师于12月17日晨发起攻击。敌军之抵抗甚为顽强，若干据点虽一度攻占，但经敌军之逆袭，得而复失。自晨至暮，短兵相接，反复冲杀，伤亡甚重，最后虽攻击顿挫，但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精神实可歌可泣，亦足以寒敌胆。

当荣1师攻击时，200师即紧随其后，展开于大球岭、大攻岭之线，时笔者任200师598团第1营营长，为准备随时超越荣1师继续攻击，曾率领本营连排长跟进至前方高地，观察荣1师的攻击情形，因此明瞭敌军阵地之编组及兵力部署，荣1师的攻击，不啻替本营作了一次火力搜索，其中特需注意六〇〇高地敌之据点，及该高地敌军的部署及火力配置。经充分了解后，当即在现地与各连排长就当前的地形、敌情，研拟了一个营的攻击计划，尤其对夜间攻击目标之认定，攻击路线之选择，步炮协同，敌侧防火力之制压，以及联络方法等均作了深入切实研究。依此实际敌情地形研拟的攻击计划，当初只是想利用机会，沟通大家的意见，未料后来真的用到了，且成为本营

圖見概役之關崑崑爭戰日抗

日九十月二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 昆仑关之役图示。

尔后攻克六〇〇高地的胜券。

荣1师攻击顿挫后，当夜即脱离战斗撤至后方整补，军部令200师接替荣1师继续攻击。200师受命后，鉴于荣1师之失利，在白昼无良好隐蔽的情形下蒙受过大伤亡，尤其在夺取敌据点后，因伤亡过多无力固守，以致未能确保既得战果，而功败垂成，最为可惜。200师乃决心于19日夜行夜间攻击，先夺取介寿、六〇〇高地及罗塘敌之第一线据点阵地，尔后再向昆仑关及其东西两侧之六五三高地、老毛岭一带之敌阵地攻击。攻击部署按原态势，以598团及600团，并列为第一线，598团在公路(含)以西夺取六〇〇及罗塘

高地，600团在公路以东夺取介寿高地。两团之战斗地境沿公路划分，公路属598团。

本团之攻击部署，系以我所属之第1营为左第一线营，夺取六〇〇高地；第2营为右第一线营，夺取罗塘高地；第3营为预备队位于大玫岭附近待命。本营奉命后，获知攻击目标即曾与各连排长详细观察研究过之六〇〇高地，因此即按照原预拟之攻击计划实施，并于下达命令前，集合连排长予以详细说明和指示。

本营攻击部署概如次：

一、第3连配附重机枪一排为主攻，由正面向六〇〇高地之敌攻击。第1连由右侧迂回攻击六〇〇高地之右侧面；第2连欠一排，配附重机枪一排，由左侧面迂回攻击六〇〇高地之左侧面。第1、第2连分别各以一部火力制压罗塘及介寿方面敌之侧防火力。

二、重机枪连在无名小高地，距六〇〇高地山脚约300公尺附近选占阵地，以主火力指向六〇〇高地及其两侧，掩护各连夺取目标。

三、迫击连（团配附）统一指挥营之迫击排，先于大玫岭占领射击阵地相机掩护营之接敌运动，待营于无名小高地就攻击准备位置后，迅速推进至无名小高地附近，选占阵地，准备对六〇〇高地行强大炮火连续不断之轰击，同时以一部火力制压六〇〇高地前方公路附近之敌战防炮，掩护营对该高地之夺取。迫击炮连须俟第一线各步兵连到达六〇〇高地山脚时，方开始射击。各步兵连于发起冲锋之前，发射绿色信号一枚，迫击炮连即延伸射程或中止射击。

夜间攻击开始的时间定为18时，预期入夜后，各部队即从攻击准备位置向目标攻击前进，因此必须在黄昏前，由原来大玫岭的展开位置，向攻击准备位置无名小高地之线推进。大玫岭距无

名小高地约为3000公尺（公尺为米的旧称），预计越野运动需一小时。又为了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尚有容许排班长现地确认目标和路线的时间，乃指示本营于16时以二线梯次疏散队形，向攻击准备位置前进。此时距入夜尚约有两小时，如果天气晴朗，部队的行动很可能为敌发现，好在当时正是冬天，当时气候于拂晓傍晚多是薄雾阴沉，能见度最多只有五六百公尺，未受敌火力干扰，于17时30分，全营顺利进入攻击准备位置，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和微弱的光度，容许各部队指示目标路线及从事最后的协调。

入夜，各连接规定的时间向目标摸索前进。营指挥所设在无名小高地后方，刁斗无声，万籁俱寂，约莫过了一小时，在19时左右，由前面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枪声炮声大作，乃知敌人已发现我攻击部队，双方激烈战斗开始。黑夜中既无法观察，当时营连之间，又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装备，上下间的情报传递均赖传令联络。我在营指挥所，虽急于希望获知各连的情况，但除了等待传令送来报告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当时我充满胜利之信念，因已有周密的计划，同时基于平时严格的训练对各连战斗力极具信心。约一小时后，当20时左右，第1连送来报告，该连一度攻占六〇〇高地，但因遭敌猛烈的逆袭，被迫放弃，现尚在该高地右侧的山腰与敌对峙中，该连并缴获敌地图、观测器材等。当时第一线的枪炮声仍不断传来，判断第2、第3连已发起突击。3个连从三方面向目标突击，即使因联系不够，未能同时或紧接着先后发起突击，如有时间误差，只要在敌逆袭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另两个连相继发起突击，仍可夺取目标。我乃传令告知第1连连长，该连即在该高地右后侧半山占领阵地牵制敌人，支援第3连作战，并尽速与第3连联系。

不久，21 时左右，第 3 连传令来报，该连已成功占领六〇〇高地，同时得知该连连长成本证在冲杀时中弹阵亡，当听完传令的报告后，来不及欣喜与悲伤，立即率领营部必要人员随同该传令前往六〇〇高地，深恐第 3 连因连长阵亡，不能确保已得之战果。后来察知第 3 连所以成功攻占目标，与前所判断的情况相同，先是第 1 连攻占六〇〇高地后，敌军自高地后方之掩蔽部中涌出实施逆袭，但敌逆袭部队尚未完成重新部署之际，第 3 连适时发起突击，第 2 连亦紧接着自高地左侧发起冲锋。使敌三面受攻，惊惶混乱，结果敌逆袭部队在混战中大部为我军歼灭，第 2、第 3 连合力攻取六〇〇高地。

我率领营部必要人员，摸索攀登六〇〇高地，约费时 50 分钟达山顶，此时六〇〇高地为我营控制，敌军的炮火及邻接据点之侧防火力，仍断续向高地及其周围射击。我到达后，立即重新调整第 2、第 3 连的防御部署，并要求加强工事及障碍设施，同时令第 3 连李排长代理连长，统由第 2 连孙连长指挥，坚守六〇〇高地，待命再行攻击。

因六〇〇高地乃敌军第一线防御阵地中锁钥部，攻占后，昆仑关已在本营之火力控制中（相距 500 公尺）。因左邻友军攻击介寿高地，得而复失，翌日拂晓后，敌必利用六五三高地既设之火力的有效瞰制及介寿罗塘凶猛之侧防火力，配合敌空军轰炸扫射，再向本营攻占之六〇〇高地发动逆袭。因此乃指示孙连长，必须坚守六〇〇高地，以确保既得战果，然后始能进一步达成攻占昆仑关及其东西两侧高地敌军阵地的任务。否则，如仍让敌逆袭夺回，则将蹈友军的覆辙，影响全军成败至巨。于是再明示坚守六〇〇高地特须注意事项，如何制压及防护邻近之据点侧防火力，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及加强构筑工事，如何反击其逆袭，如何阻杀其迂回包围我

两侧之敌，以及对翌日白昼敌机之轰炸扫射，如何使用重机枪对空构成火网，防制敌机俯冲扫射，以减少损失，希在 20 日拂晓前彻底完成诸般准备。

由于六〇〇高地及其周围均为岩石及砂砾，工事构筑不易，又毫无树木可供隐蔽，且幅员亦不充分，如果将全营连指挥所均推进至六〇〇高地，徒然增大伤亡。经一再考虑，决将营指挥所仍留原地，同时将第 1 连改为预备队于无名小高地附近占领阵地，使我六〇〇高地的防御，形成两个据点彼此支援之有利态势。部署妥当后，并监督将伤亡官兵后送完毕，于午夜零时左右回到营指挥所，当即攻占六〇〇高地的经过及本营现况电报上级。

本营以一夜间争夺六〇〇高地的战斗，激战虽约 3 小时，官兵伤亡竟高达 80 余名，敌军伤亡估计总在 150 名以上，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尤对第 3 连成本证连长的壮烈牺牲，至感悲痛与惋惜。

19 日的夜间攻击，我 200 师参与攻击的部队，除本营夺取的目标外，左右友军与敌形成拉锯战之态势，无显著成果。故当本营战果报至集团军司令部时，竟未获置信，怀疑报告中的六〇〇高地是弄错了地点，后来总部派员与军部会同至现地验证，确定无误后才向上级转报。

本营夺取六〇〇高地虽获成功，但左右友军未能攻占介寿及罗塘高地，遂使本营的位置过于突出。此对于确保该高地战胜敌之逆袭颇为不利。

20 日自晨至暮，一日之间，敌 5 次向我防守之六〇〇高地实施逆袭，敌空军亦同时轰炸扫射，其介寿、罗塘方面敌之侧防火力，六五三高地之平射炮火，均同时向六〇〇高地射击，火力十分猛烈。由于三面受敌，且除简单工事外，别无可供掩蔽隐藏之地形地物，以致情势异常险恶，赖全营官兵誓死抵抗，奋战到底，将敌军逆袭一一击退。但本营官兵伤亡高达 160 余员，比 19 日夜

间攻击所受之损失更高出一倍，至此本营两日战斗几已伤亡过半。不过敌军的损失亦决不低于我方。

所幸是日左右邻接友军，亦对罗塘、介寿等高地继续猛烈攻击，虽未奏功，但是以牵制分散敌军而间接予本营以莫大之协助，否则本营是日战斗可能更为艰苦。

由于两日来全师攻击战果，只有本营攻克且尚坚守中之六〇〇高地，其所应受到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21日晨，军长杜聿明将军在电话中对本营慰勉有加。他认为六〇〇高地为敌军阵地之锁钥，本营将其攻占，牺牲虽大，极有代价，必须全力固守，以为继续攻击之支撑。我即趁机将本营的现况向军长报告，本营决誓死坚守六〇〇高地，待援再与攻击，不过本营两天来已伤亡过半，现守备六〇〇高地的官兵只剩百余人，并相当疲乏，要应付敌可能继续不断的逆袭，深恐力有未逮。个人死不足惜，但如不能达成军长交付之任务，影响全军作战的成败，如此牺牲则毫无代价。军长听了我的报告，亦感事态严重，当即指派骑兵连归营指挥，但因不在附近而作罢。继乃改派战车连归营指挥（战车连的连长是来台后曾任装甲第1师师长鲍薰南将军），当时我即表示战车是攻击武器，在绵亘的高山峻岭地形，战车行动困难，英雄似无用武之地。军长即指示，善为运用战车机炮火力，可使战车占领半遮蔽阵地，担任火力支援任务。一个战车连之机炮火力，集中使用于预期敌军可能出现之处，构成火力急袭点，歼灭来犯之敌，最具杀伤力。于是遵照军长之指示，令战车连于营指挥所右方一带小高地占领半遮蔽阵地，并令第1连协助其构筑工事及修筑机动道路，同时令战车连将下列敌可能出现处组成火力急袭点：六〇〇高地及其两侧；罗塘高地；六〇〇高地与罗塘高地间之鞍部。以上三处目标，均精确判定其距离并试射，然后编

定号次分别记录射击诸元，只要敌军于此等目标出现，于一二分钟内，使全营所有机炮火力组成火力急袭点指向目标（火力急袭点计含三七战车炮7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11挺，轻机枪15挺以上）。后来果然发生奇效，歼灭了敌人300名以上。军检讨作战得失时，誉本营以集中火力奇袭歼敌为本战役之一大特色。其经过情形如次：

一、22日拂晓，我搜索队发现敌军数十名已进至六〇〇高地右侧，距离指挥所仅约300公尺，我立即下令对第一号火力急袭点实施猛烈射击，结果不到两分钟敌军全部被歼灭。

二、23日午后，此际荣1师已由我598团第2营之右前侧面向罗塘高地攻击，敌约二三百人被迫沿该高地向后方山腰求取掩蔽，该处恰好是我预设第二号火力急袭点的涵盖地区。当时师长戴安澜将军适在营指挥所，我当即面报师长恳准以火力支援攻击中之友军，另由师长电告友军指挥官，结果敌军受此火力奇袭，大部敌人被我歼灭，时不过5分钟。原来罗塘高地方面敌军之炮声、枪声顿告沉寂，荣1师顺利攻占了罗塘高地。

荣1师攻占罗塘高地之前，因六〇〇高地在我手中，已对敌发挥了极大的牵制作用，此可从本营夺取六〇〇高地之后，敌不断发起逆袭见之。复因新22师迂回行动得以实现，于22日夜占领了老毛岭南方四四一高地。四四一高地为我军攻占后，敌之增援、补给、联络为我截断，敌军的态势遂趋不利。

荣1师于24日继续攻击，由罗塘高地指向六〇〇高地与四四一高地之间老毛岭。因昆仑关之敌孤立无援，加以伤亡惨重，荣1师攻占了老毛岭后，即一举夺取了昆仑关。

昆仑关之战，我第5军损伤累累，但日军第9旅团长以下，则完全为我包围歼灭，实为抗战史中

所仅有之歼灭战例。以第5军3个师(9个团)对日军第9旅团,含4个联队的(相当于4个团)兵力,仅优势一倍稍多,而能创此战绩,亦为抗战史中所仅见。

检讨昆仑关之战所得而言者,概有以下数端:

一、日军判断错误:日军自抗战开始以来节节胜利,中国军队以装备劣势,亦多取避战姿态,鲜采主动攻击,因此日军遂大胆轻敌。以此次战役为例,日军以一个加强师团,竟敢孤军深入达200公里,复于侵入南宁后,面对我军主力所在,仅以一个旅团防守,均显示日军之过于轻敌,而陷于判断错误。日军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主动进攻,并且具有并不比日军逊色的攻击战力。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一般部队之装备训练,均不及日方,而我所持以抵抗强敌者,全赖上自将帅,下至士兵的一颗同仇敌忾之心,前仆后继。第5军除有一般部队的旺盛士气外,在装备及训练方面,亦较敌逊色不多,是最高统帅部着眼最终决战而培养的部队,此为日军始料所不及。

二、六〇〇高地早期攻克与确保,在精神上足以提高我官兵战胜的信心,并激发全军旺盛的士气。在战术上,六〇〇高地攻占足为尔后攻击之支撑,并牵制敌军,使我军获得行动之自由。当12月17日荣1师攻击顿挫后,如200师之攻击又遭挫败,则尔后再与攻击,非经相当时间之整顿不可。幸200师之攻击,在敌阵地中央部分,夺取了具有关键性的六〇〇高地,并在尔后数日内防守期间,对敌多次的强有力之逆袭予以摧毁,得以确保。

三、六〇〇高地之成功夺取与确保,决非幸致,检讨我598团第1营在此战役中之所以获胜,概有以下原因:

(一)适时而有效利用荣1师攻击机会,汇集敌军情报,同时荣1师之攻击也提供了具有价值之经

验与教训,使本营随后之攻击避免了同样的错误。再友军之先期攻击予敌军重大伤亡与阵地之摧毁,对本营紧接攻击,实有莫大之助益。

(二)绵密的计划和准备。由于事前有充分明瞭敌情的机会,因而从容策定周密攻击计划,并依计划作了绵密的准备,致实战时,均能依计划顺利完成任务。

(三)典范令行动。平时部队训练时,上级多以“操场即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两句训示相期勉,因之本营平日训练均本典范令严格要求而实施,此次战役得到了收获。在战后检讨会上,杜军长称誉本营此次之攻占六〇〇高地是典范令行动,可以说此战胜利成功关键是平时严格教育训练的成果。

(四)上级适时支援。六〇〇高地攻占后,其左右敌军据点即陷于拉锯战,此时我六〇〇高地即形成孤军突击,加以占领部队多疲乏不堪,处此危急待援状况下,上级适时以战车连支援,不但对尔后作战发生实际的功效,且予当时官兵莫大激励。

四、后勤补给无缺。此次战斗主要后方联络线系沿公路,本军配有一个汽车团之充足运输工具,致使后勤补给无缺。

后记

七七抗战至今已50周年(本文作于1987年),昆仑关之役亦近半个世纪。本人当时年仅30出头,如今已是80老人。鉴于有关记述昆仑关之役的战史资料,无论军方出版或私人著述,均仅有一般的经过描述,对于具有关键性的战斗实况,竟未提及或语焉不详。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记忆所及予以记述,以补史料之不足,同时亦藉以纪念当时并肩血战阵亡官兵之忠魂。📖

漫谈黄埔炮兵教育

□ 单补生

炮兵作为陆军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其核心使命在于凭借强大火力摧毁、压制并震慑敌军，素有“战争之神”的称誉。

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军官主要来源于黄埔军校（中央军校）各期炮科毕业生。每期炮科毕业生约为百人，约占当期毕业生总数的十分之一。除个别时期（如第8期第1、第2总队及第10期曾设有两个炮兵队）外，通常每期仅设一个炮兵队。炮科学生要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和

强健体魄，符合炮兵兵种的基本要求。在校期间，他们接受为期3年的系统养成教育，熟练掌握炮兵军官所需的战术与技术基础知识，内容涵盖炮兵运用、射击指挥、观测通信、驭马术等，尤其要对炮兵连的指挥流程达到娴熟运用的程度。

教学装备以野炮、山炮为主，常用训练火炮包括克虏伯野炮、三八式野炮及卜福斯山炮等，其中改造后的三八式野炮与卜福斯山炮使用频率较高。

教材体系以德式为主、日式为辅，由德国顾问指导教学。全面抗战爆发前，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生总数不足千人，当时炮兵部队规模有限、发展空间狭窄，致使不少炮科毕业生转往其他兵种。

炮兵学校之源起

黄埔军校对筹建炮兵专门教育机构极为重视，此举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其一，建立隶属于黄埔体系的炮兵部队；其二，对现有炮兵部队业务生疏、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加以整顿。

黄埔建军之初，仅配备少量山炮。东征期间，陈诚指挥的山炮连仅列装6门火炮。至北伐时期，陈诚虽晋升为炮兵营长，但火炮数量并未增加。随着北伐节节推进，部队陆续缴获多种型号火炮，包括前清引进的克式山炮、沪造山炮、克式野炮、三八式野炮，以及清末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架退野炮等。对于收编的各路军阀炮兵部队，仅能派驻团、营级主



/ 克虏伯野炮。



/ 三八式野炮。

官，原有附职人员（如团附、营附等）仍须留任承担具体业务，连级以下骨干基本维持原状。这些部队思想认同度低，遇利益冲突时甚至表现出敌视情绪。例如1930年，第7期炮兵科毕业生赴汉口炮4团见习竟遭拒绝，后经教育长何应钦亲自协调方得接收。报到时，第1营郑营附直言：“南京已有新成立的炮兵团，诸位远道而来争此旧职，实非明智之举。”

北伐时期不仅缺乏技术骨干，系统训练时间亦严重不足，导致炮兵在作战中屡现失误。东征惠州战役中，6门山炮同时发生故障，不得不请苏联顾问赴阵地排查。后续收编的炮兵部队虽经长期训练，能完成基

础射击任务，但技术水平有限，稍复杂的间接瞄准技术多数人员尚未掌握。此状况不仅存在于作战部队，教育机构亦不例外。1929年，黄埔军校购12门“改造三八式野炮”及配套器材，不仅校内教官无法胜任教学，留日归国教官在演示时竟损坏完好的方向板。同期在南京浦口试射中，因操作失误导致炮弹出膛即炸，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击毁了火炮护板。

上述诸多因素，最终促成了炮兵学校的创办，以系统培养专业人才，全面提升炮兵部队作战能力。

炮兵学校办学经过

1931年9月7日，国民政

府颁布《陆军炮兵学校条例》，明确该校设立宗旨如下：一、对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毕业之军官候补生施以炮兵初级军官教育；二、召集在职炮兵军官，提升其射击战术、观测通信、驭马等技术，并推动相关技能普及于各炮兵部队，或予以进一步深造；三、调查研究与炮兵相关之学术理论；四、试验并研究炮兵所用兵器、器具及材料等。筹备期间，先后任命训练总监部炮兵监张修敬（江苏江宁人，日本士官8期炮科）及陆军少将张亮清（湖北汉阳人，日本士官6期炮科）为筹备处主任，委员有周斌（湖北武昌人，日本士官4期炮科）、蔡忠笏（浙江东阳人，保定军校3期炮科）、李端浩（江苏仪征人，保定军校3期炮科，后留日深造）等，负责筹建炮校，并通令全国炮兵部队选拔学员入学。

1931年12月1日，陆军炮兵学校正式成立，为我国陆军各兵科中建立的首所专门学校，校址设于南京三牌楼旧三十三标营房。第1期共录取学员116名，学制一年，其中术科训练时间占一半以上。因旧三十三标营房地处市区，难以满足炮兵教学与训练之特殊需求，另觅郊外新址成为当务之急。汤山

著名士绅唐庆升介绍说：“汤山西南有座半边山，南坡平缓开阔，北坡陡峭，形如刀削，故名半边山。山北没有村庄，前清八旗兵下乡打野操，炮兵在半边山打靶，不曾伤及人畜。”于是炮校外迁汤山。

陆军炮兵学校新址位于汤山作厂，占地约2平方公里，主建筑是办公大楼，此外还有炮兵射击场、观测塔、营房等，由天津建隆营造厂、上海利源营造厂和姚记营造厂建造。从勘察设计到监督施工，均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进行。办公楼位于小山坡上，占地4000多平方米，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木质地板。大门前6根立柱拱成欧式风格，大楼顶部建有10余米高的钟楼，下有地道。大楼由主楼和左右两个副楼组成，南北呈王字形布局，楼上中间有通道相连。当时，炮兵学校的设计、建筑质量均为一流。炮兵学校的北大门和东大门为碑亭式建筑，水泥浇铸，甚为壮观。

炮兵射击场，东西长9公里，南北宽3公里，场内公路纵横，建有射击观测塔三座（小营房、大凹、高庄）及射弹观测碉堡30处。射击观测塔是炮兵射击场的标志性建筑，建成



/ 卜福斯山炮。

于1933年6月和8月，为砖混结构，塔身圆形，直径4米多，高约20米（5层）。每层均留有观测孔，顶部为亭式，第一层局部为方形。射击观测塔异常坚固，至今依然矗立在山坡上。射击场因地貌复杂，可灵活选择阵地与目标区，实为理想的实弹演练场所，被称为“亚洲第一靶场”。

汤山炮兵射击场建成后，1934年国民政府向德国订购了96门最先进的榴弹炮，并把其中的24门交给炮校，成立了机械化炮兵团，进驻东、西营房。由于炮兵团经常进行实弹射击，靶场附近的农民把捡炮弹皮当成了一项重要副业，流传着“不

怕一年不收稻，就怕三天不打炮”的民谚。

1935年7月，炮兵学校第4期学员迁入新址“汤山炮校”。据学员裴学度回忆：“欧美各国之炮兵学校，除法国枫丹白露陆军炮兵学校在建筑规模上可与汤山炮校媲美外，余者无出其右。”

1936年，为满足教职员家属居住之需，炮校于侯家塘附近兴建家属住宅区。为呼应当时推行之“新生活运动”，该区被命名为“四维村”。所谓“四维”，典出《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至今步入四维村，有关“礼义廉耻”之标语仍随处可见，村

民亦能详述村名由来，足见地名承载历史记忆之深远。

历任校长（1931—1949）：首任周斌，继任邹作华（吉林人，日本士官12期炮科），后由蒋介石兼任（自1935年4月1日起），再继任者为洪士奇（湖南宁乡人，日本士官21期炮科）。教育长先后由张亮清、周斌、邹作华、史文桂（保定军校8期炮科）、金镇等人担任。教育处长则有李瑞浩、项致庄、邵百昌、赵以宽（河北天津人，日本士官10期炮科）、金镜清、王和华（河北宁河人，日本士官13期炮科）等。校部设政治部、射击场管理处等机构，教育处下分设教育室、军械室、副官室、秘书室及战术、兵器、筑城、射击、观测、通信、马术驭法等专业组别。

教官队伍中，除少数德国顾问外，多数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生，亦有少数曾留学欧美者。国内教官则包括来自海军、空军及陆军大学的战术讲师。汤山时期之战术教官有黄模（江苏江都人，陆大5期）与黄国书（台湾新竹人，日本士官10期炮科）；测地教官为翟家林、彭孟缉（湖北武昌人，黄埔5期，日本野战炮兵学校毕业）；射击教官人数较

多，其中胡雄声誉卓著，被公认为射击权威，后来其离校升任江宁要塞炮兵司令。

抗战期间，炮校多次迁移：1937年11月迁至湖南零陵。1938年1月转往桂林，不久返零陵复课。同年11月长沙大火后，再迁广西鹿寨。后经柳州、河池、南丹等地长途行军，于1939年1月抵达贵州都匀，借都匀一中校舍继续办学，俗称“都匀炮校”。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炮校迁返汤山原址。1948年底再度南迁，先后驻贵阳、云南沾益。1949年12月，教育长李康庵率部分人员在云南曲靖投诚。

1949年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汤山炮校。1956年2月更名为南京炮兵学校。1986年改为南京炮兵学院，沿用至今。院内现存南大门、北大门及三栋办公楼。此外，在作厂以南、高庄以北地区，仍保留三座射击观测塔及一座无线电信号塔。

炮校历年班次概述

1931年12月15日成立普通科。召集少尉以上军官，修业时间为一年，以兵器射击、观测通讯等学理及应用为主，提高其学识技能，并作高等科考

选之基础，因之以普通科学与兵器学为重点。自1931年12月成立以来，每年召集一期，至1942年2月止，先后共结业11期，嗣后因学校驻地未定，故奉令暂停召集。

1932年11月成立观测军官训练班。召集下级军官，专门训练观测课目，以应部队教育之需要。自1932年11月至1937年7月，共召集学员4期。

1934年3月14日成立校官研究班。目的是加强部队中级军官之战术修养、指挥能力，且利用部队抗战之经验教训使学校与部队切保联系，以增强战斗之韧性。仅一期后，改为校官班，修业时间为3个月。自1935年至1939年，共计召集10期，此后即为战术班。

1935年1月成立空中侦测班。建立目的为训练空中侦测之技术能力。自1935年1月至1937年7月，共召集学员4期。

1935年2月成立上尉训练班。召集炮兵上尉军官，修业时间为6个月，授以射击指挥与战斗教练，增进其射击技术与指挥能力。自1935年2月至1939年底，共计召集10期。

1935年10月成立中少尉训练班。召集各部队中少尉军官，修业时间为6个月，授以观测通



/ 黄埔4期炮兵大队演习。

信为主，而间以战斗教学，增进其观测通信之技能。自1935年10月至1939年底，共召集9期。

1936年2月成立要塞军官讲习班。召集要塞炮兵军官，施以加强教育。自1936年2月至1937年9月，共召训8期。1946年3月至5月又召集要塞科军官队1期。

1936年2月成立师炮兵尉官训练班。召集师炮兵尉级军官，施以两个月召集教育。自

1936年2月至1936年9月，共召集4期。

1936年2月成立要塞军士讲习班。召集要塞炮兵部队之军士，加强其学术技能并统一其动作。自1936年2月至1937年9月，共召训8期。

1936年9月成立探照灯训练班。建立目的为训练探照灯队干部，共召集1期。

1936年11月成立要塞干部调练班。召集各部队炮兵军官，施以要塞炮兵之训练。自1936

年11月至1938年4月，共召集两期。

1937年4月1日成立高等科。考选普通科毕业军官，加深其造兵之学术与理论，养成高等炮兵技术军官，并可兼任造兵之任务。1937年4月开始召集第1期，共有学员16人，于1938年7月22日毕业。1938年10月10日召集第2期，计有学员9人，于1939年11月30日毕业。因抗战期间，注重军官一般之指挥能力，又因该科



/ 南京汤山陆军炮兵学校碑亭式大门。



/ 南京汤山陆军炮兵学校射击场观测塔旧址。

教官人选甚难物色，乃告停办。

1937年9月成立尉官训练班。召集中央军校初毕业之军官，施以加强炮兵之教育，使其更有良好之基础。自1937年9月至1939年5月，共计召集5期。

1937年11月成立准尉训练班。召集优良军士及准尉级军官，加强其学术能力，使堪任准少尉军官之职务。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底，共召集6期。

1937年12月成立军士队。招考文学校初中学生及各炮兵团之优秀军士，施以炮观通之基本教练及典范令，使其毕业堪任炮兵军士或下级军官。自1937年12月至1940年7月，

共召集3期。

1938年成立炮空联络队，专门训练炮空之联络。1938年至1939年，共召集1期。

1938年6月成立无线电信班。召集通信军官训练无线电通信。自1938年6月至1940年7月，共召集2期。

1938年9月成立代训陆军军官学校炮兵学生队（简称代训）。训练之目的与军官学校完全相同。1938年9月，由中央军校拨来14期1总队学生，转为炮兵科。1939年2月，招考代训军校16期学生总队。同年8月，由六分校拨来15期学生转入炮科。1940年2月，召集代训军校17期25总队第2大

队转入炮科。1940年10月，由第六分校拨来17期独立第8大队转入炮科。1941年10月，召集代训军校18期独立第5大队。1943年5月，召集19期独立第1大队。1943年9月，由防空学校拨来19期学生受炮科教育。1945年1月，召集代训军校20期第5大队转入炮科。同年4月，第四分校拨19期第4大队转入炮科，代训该大队于1945年11月底毕业。代训军校20期学生第5大队，1946年6月底毕业。

1938年10月成立下级干部训练班。召集学生或部队优秀军士，施以炮兵训练，毕业后使充下级干部或军士。自1938

年10月至1939年12月，共训练2期。

1940年4月成立射击班。教育之目的与上尉训练班相同。此班由上尉训练班改成，至1945年2月底为止，共计召集10期。

1940年4月成立观通班。召集人员同中少尉训练班，自1940年4月至1945年2月止，共召训10期。此班与战术班、射击班，合称为短期班，同时召集同时毕业。

1940年4月成立战术班。召集炮兵校级军官，授以各兵种协同及战斗教练等，增进其战术修养与指挥能力。自1940年成立后每半年召集一期，到1945年2月底，共计召集10期。后因学校校址不定，遂奉令暂时停办。

1940年8月成立技术训练班。召集军士或下级军官，施以劈刺之专门技术训练，仅训练1期。

1943年成立军士连。招考人员标准与军士队同。自1943年至1945年9月，共召集4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炮校于1946年4月迁回南京汤山原址，校长为洪士奇。不久，学校改为美式新制，组织架构有所调整。设校长、教育长各一

人；设训练处，主任由教育长兼任。训练处下设第一处（行政）、第二处（教务）、第三处（补给）、训导处、学员大队、练习营及勤务连。另设要塞干部训练班，由主任周宏沼负责，班本部下设学员第1队、第2队及探照灯队。

高级班在军官教育制度新旧交替期间开始召训，依据《军官教育计划大纲》，暂定甄选原军校毕业及军官训练班毕业、服役满5年以上的军官入班受训，结业后仍返原部队服务，直至新制军校毕业军官可参与受训为止。具体召集办法由陆军总部拟定。

炮校遵照国防计划，按1947年度预定召训班次如下：

初级班：1947年2月召训第1期，每期30人。自第5期起拟增至每期60人，本年度计划召训8期，合计370人，教育期限暂定为4个月。

高级班：本年度计划召训1期，名额60人，教育期限暂定为6个月。

特别班：包括通信、摩托、兽力运输、测量、兵器等5个专业军官班。本年度计划召训340人，教育期限除兵器班、摩托班为2个月外，其余3班均为3个月。



/ 郝柏村。

炮兵初级干部的培养，分别由军官学校附设炮兵军官训练班召训1中队（100人），以及炮兵学校附设军官训练班召训学生80人，合计180人，6个月毕业。原计划毕业后继续召训第2期，但因炮校于1948年底南迁，教育工作中止。

黄埔生忆炮兵教育

郝柏村（1919—2020），江苏盐城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2期炮科、陆军炮兵学校（尉官班、普通科）、陆军大学20期毕业，官至台湾当局陆军一级上将。

郝柏村将军回忆：

我于1935年投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当时日本军

阔对我压迫日紧，军校甚至在北平都不能公开招考，不得不采取秘密招考。相较 10 期及 11 期均录取两千人，军校 12 期录取名额也减至仅六百人。但当时青年抗日报国情绪激昂，考生有大学程度的，亦有小学老师，我以初中毕业程度投考本难录取，结果竟上榜了，我也因此是 12 期中年龄最小的，同期同学甚至有长我 10 岁的。

中央军校炮兵科

1935 年 9 月，我于南京通光营房入伍。入伍教育共 9 个月，相当于文学校两个学期，除操场教练、体能训练和步兵班排教练外，以普通科学教育为主，诸如物理、化学、数学均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的程度，我也都能轻易接受。外语教育亦受重视，由于学校有德籍顾问，且学军事者都梦寐有朝一日能到德国留学，我乃选修德文，从 ABCD 开始学起。记得当时教师是留德的谭医生及他的德籍太太。此外，三民主义及人生哲学教育也是重点。

我们的军事训练在德籍顾问法尔肯豪森上将主导下，完全采用德式教育，踢正步时两手紧贴胯部而非摆手，单兵与班的战斗动作要求更是严格。这些德籍顾问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职的军官，任何一个小动作如做

得不够确实，必须重做到完全正确为止，德文的“重来一次”以及“不对，不对”经常在我们耳边响起。

记得有次一位同学在单兵战斗教练匍匐前进时，在山坡上通过棱线过快，德籍顾问竟提起他的双脚，拉黄包车似地把他从山坡拖下 50 公尺远，命令他重来。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对我一生的治军教战事业产生重大影响，日后我在军队训练中“从实、从严、从难”的政策要求即播种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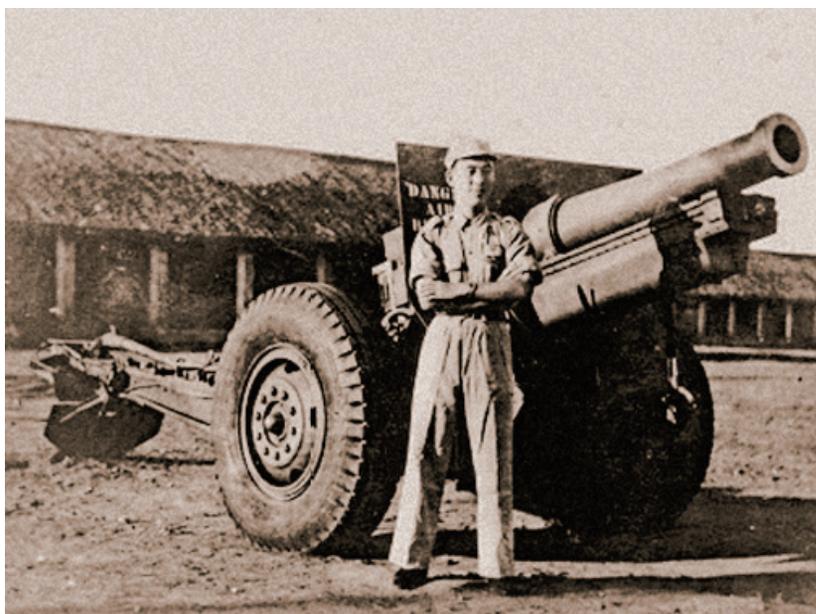
入伍教育前 3 个月，完全没有假期，旨在彻底改变学生的生活习惯及观念，将一个散漫的文学生重塑为一名有规律、有纪律、有服从性的军人。初入伍，文学生最头疼的就是整理内务，卧被须叠成豆腐干似的，并用内务板夹出棱角线条，才算合格；洗脸盆内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及洗脸巾挂法都有规定。文学生常质疑这种内务训练与打仗有什么关系，难道到战场上可以内务比赛打倒敌人吗？当时内心实在讨厌那些检查内务的班长，尤其他们只知执行规定，说不出这些规定深一层的道理。直到我军阶渐高，体会到“成于一”是建军的最高哲理与要求，才领悟出整理内务的军事哲学道理。

……

按军校规定，入伍生入伍期满原应放暑假，但我们因 6 月 1 日两广事变取消暑假，先行分科教育。入伍 9 个月，除普遍学科外，军事训练都是步兵的班排教练。入伍期满后，就要以各兵科的军事训练及军事教育四大教程为主，也就是战术、兵器、地形和筑城。

我分至炮科，当时是各科最为吃香的，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志愿，须以考试筛选，所以一般认为炮科较重视学科，学生素质也高。那时其他兵科学生仍是穿草鞋、打绑腿，只有骑兵科及炮兵科穿马靴，看来气宇轩昂，也成了吸引年轻人的一项诱因。我们升学后，由通光营房移驻黄埔路校本部的炮标营区。我们原定 1936 年年底下部队实习，任下士班长 3 个月，但 12 月 12 日惊传西安事变，部队又进入动员备战状态，因此部队实习 3 个月规定被迫取消。

1937 年，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燃起中日全面战争。八一三上海战役紧接着爆发，八一四日本空军轰炸南京，军校师生避处江西九江 5 个月后，原则上决定迁校至四川成都。但南京失守，部队基层干部伤亡甚重，需求孔急，12 期因而决定提前半年毕业。



/ 郝柏村在美援 155 榴弹炮前留影。摄于 1943 年印度兰姆迦。

……

毕业后我们一面接获分发命令，一面获准返家省亲。我回乡时抗战爆发虽已半年多，但苏北似无任何战争景象。我在家只能逗留 10 天，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全家人乃到盐城小住两天，也是母亲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城墙，第一次坐黄包车，我发愿日后要带母亲到江南等大都市玩玩。我们也拍了一幅全家福相片，不料这竟是母亲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照，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的团聚。

炮兵学校尉官班

休假结束，我将军校所发置装费、旅费及月薪约三百银元交付父亲，在当时是一笔不少数

目，然后经由徐州、郑州、武汉到湖南零陵炮兵学校报到。我分发到炮校尉官班，接受炮兵初级军官专业教育，课程重点在观测与射击。炮校受训期间，传来台儿庄会战捷报，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但也预告全面徐州会战即将开始。

抗战之初，我陆军缺乏炮兵，苏联乃援助我 762 野炮及 115 榴弹炮数百门，成立炮 20 团于湖南祁阳。我炮校尉官班结业后，原拟分发至炮 20 团 1 营 3 连任排长，那年我 20 岁，正是个纯洁热情、干劲十足的青年军官。适此际，我在军校的队长林路生（军校 6 期留英）在新成立的炮 14 团当营长，该团装备

德式 150 榴弹炮，不同于苏联援我的马拽式火炮，乃当时最进步的汽车牵引炮，14 团急需干部，我们几个同期毕业的同学便至湖南耒阳炮 14 团报到。

我被派至 2 营 5 连担任观测官，团长洪士奇（黄埔 2 期留德），营长郑瑞（黄埔 6 期留德），连长刘鹏翼，东北人，是炮兵监刘翰东的侄子。这个连由原东北军改编，士官兵也都是东北人，装备从原来的骡子拉炮改为新式汽车拖炮，尤其是国内口径最大、射程最新的新炮，部队官兵自然士气高昂。但连内士官都已年过三十，却由我这个二十郎当、尚无太多部队经验的军官来带领，幸好大家相处还算融洽。

1939 至 1940 年之际，全国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 5 军与所属 200 师及 22 师也驻在湘桂边境全州、零陵、祁阳一带，附近丘陵地带是很好的野战部队训练场地。我们的汽车化重炮兵，也经常配属第 5 军作训练与实弹演习。当时第 5 军军长杜聿明、200 师师长戴安澜及 22 师师长邱清泉，都是年轻有为的国军将领，我有缘躬逢其盛，体会到他们都非常重视演习前的沙盘推演及演习后的讲评；杜军长特别重视战斗小动作，会手撰

部队急要小动作要求的小册子，对我日后建军治军做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在其他兵科眼中，炮兵的间接瞄准及远隔观测射击还相当新奇。记得某次150榴弹炮实弹射击中，杜聿明、邱清泉、戴安澜、廖耀湘等长官都来观测所参观，我们运用测地成果和远隔观测射击法，很精确地命中目标，参观者看不到炮阵地，炮阵地当然也看不到目标，但炮弹准确落在目标区内，我这个年轻的观测官受到他们嘉许，他们对德式150口径榴弹炮也建立了充分信心。尔后第5军反攻昆仑关之役，炮14团第2连的林初耀（广东兴宁人，黄埔10期炮科）也建了大功。

炮兵学校普通科

1940年下半年，我调重炮1旅补充营上尉连附，主持全炮兵旅的士官干部训练班，驻在湖南祁阳孟公山。但补充营只是训练干部，没有装备，也没有作战任务，我渴望进一步充实学能，乃决定到炮兵学校普通科受训。

炮校普通科教育仿照日本的炮兵工程学校，一年课程中以理工为主，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力学、机械学、火药学、材料学、统计学、弹道学等，虽然对初级炮兵军官并无大用，但却

充实我理工课程若干基础概念。多年后我担任“参谋总长”并兼任中山科学院院长，当年奠下的知识根基裨益甚大。

炮兵学校设于大后方的贵州都匀，在那物质条件困窘的年代，校舍用木板简陋搭建，晚间照明都是用桐油灯，灯光昏黯，还要受烟熏，书籍纸张极为粗糙，读书很是吃力，我就在一年之间变成轻度近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成为抗日同盟国。虽然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在菲律宾、中南半岛、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等地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但当时正在炮校普通科受训的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坚定不移，对国家前途也怀抱乐观。我预期中美军事合作的必然性，亦加强自修英语，为此经常到教堂去参加澳籍牧师的英语查经班。

1942年我回到湖南祁阳，调任重炮1旅补充团第2营第6连连长，此际我才23岁，求学心愿强烈，总觉得青春长期耗在基层部队琐事殊为可惜，且虽然军校毕业并在炮校深造一年，仍觉学无专长。适巧这年夏天，中央政治学校在广西桂林招考，我的兴趣本来就广泛，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饶有兴趣，

乃前往参加考试，竟在外交系录取了。我自许既已接受军事养成教育，若再就读文大政治系，27岁毕业，即可成为军事与政治的全才了。

然而，当我向旅长洪士奇将军报告，请准我离职到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就读时，部队正奉命出发到印度参加远征军接受美援装备，洪将军坚不准我离去，并谓现在重要政治领袖大都是军人出身，又何必转至中央政治学校学习政治？何况部队出发远征印度，是多么光荣的一桩任务。就这样，我去中央政治学校的志愿落空了，也是决定我一生发展的一次关键性抉择。1943年10月，我考入陆军大学20期，修业期3年。

参考资料

1、文闻编《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与军事专科学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

2、谭学正编著《最新陆军军官教育纪实》，拔提书局印行，1948年5月初版。

3、郝柏村著《郝柏村回忆录》，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8月8日。

4、汤山街道志编纂委员会编《汤山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



1926年6月23日， 黄埔军校举行沙基惨案纪念会

□ 李岚

1926年6月23日是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日。上午9点，黄埔军校师生在大操场隆重举行沙基惨案纪念会，“以示不忘国耻之意”。同日，黄埔军校各团队积极派代表参加广州各界为纪念沙基惨案、悼念死难同胞而举行的大巡行活动，参加巡行的部队有：步兵第1团（两营），步兵第2团（两营）：政治大队派1队，经理大队派1队，工兵大队派1排，第10队

派1排，炮兵大队派1队，指挥官由训练部主任指定。

沙基惨案经过

沙基惨案是1925年6月23日发生的一起英、法帝国主义疯狂袭击屠杀广州市民的灾难性事件，对此后的省港大罢工、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埔军校师生是沙基惨案的亲历者，作为革命军人深受震撼，亦因

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925年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等在东较场召开各界援助上海五卅惨案大会，“人数在五六万以上”。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参与巡行的团体达数百个之多，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出发巡行。军界由党军第1师长何应钦担任总领队，排列次序为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堂学生、黄埔军校入伍生、党军第



/ 1925年，广州各界响应五卅运动大游行。

一及第二团。按照预先规划的游行路线，游行队伍由东较场经惠爱东路、永汉路，直出长堤西濠口、沙基、莱栏街、蓑衣街、杉木街、福德里、十八里甫、太平门至西瓜园散队。游行群众均臂缠黑纱，手持纸旗，上书“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上海五卅惨案”等口号，并沿途散发传单，航空局派飞机凌空散发传单，秩序井然。下午2时40分，游行前队已经进入街内，后队达到沙基西桥口之际，“虽有往对岸高呼口号者，然决无何种暴烈行动……且沙基附近有军警多人，手持白旗，维持秩序。当岭南学生及湘军将要抵达西桥口之时，沙面武装站立的英法等国土兵，忽躲进沙包之后，向沙基游行群众射击”，路狭人稠，“途人争相奔避，因而被踏伤及挤下水者亦不计其数”。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斯时死伤者已纷纷倒坠于街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当时后队巡游军人尚不知道前方惨杀事故，仍继续前进，英兵又在租界内桥口的洋房上放机关枪数百响，向陆续走来的巡游军人射击。



/ 沙基惨案现场。

总领队何应钦看到现场惨烈情形，知道必会酿成国际事件，为免落口实，当机立断，严令参加游行的军人禁止回击。参加巡行的黄埔军校官兵顶着列强的枪炮，冒着生命危险维持秩序，将群众疏散到

骑楼屋柱下隐蔽。3时15分左右，英法兵见并无还击，遂停止射击。广州光华医院救伤队第一时间赶到沙基，据后来救伤队的报告称：“到沙基，行人绝迹，店铺倒闭，只见尸体数堆，约三四十具。穿肠破脑者

有之，折骨者有之，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又查尸体及伤者之伤口，有入口小而出口大者，有出入口深阔均数寸者，间有盈尺者。此等弹子，想具炸力甚大，以之猎兽，犹有未忍，乃施之于吾同胞，可谓绝灭人道者矣。”现场惨状由此可见一斑。

参加沙基惨案的黄埔军校师生情况

黄埔军校历来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传统，为声援上海罢工工人，此次参加大会并巡行的，有黄埔军校入伍生，由原黄埔校军改组发展而来的党军第1师第1团第3营、第2团第2、4、7连等。“入伍生”应为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总队。6月14日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该部担任广州市区的巡逻工作，当时驻扎在东山原桂军学校旧址。当日清晨列队点名时，“连值星传达参加大示威游行，声援上海、香港工人的斗争。同学们莫不义愤填膺，踊跃参加”。事后统计黄埔军校在沙基惨案中的牺牲者，亦是以3期生居多。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游行。据媒体报道，惨案发生时，走在两侧同其并肩前行的两人都不幸

被子弹打中而身亡，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身为军界领队的何应钦回忆当时的情形，称彼时已过沙基向油栏街行进，正下令停止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之际，惊闻队伍后面有枪炮声、喧哗声、哭喊呼救声，返回去见到现场的惨烈情况，“忖度大局及残酷情形，知已酿成国际案件，非一部分武力可以解决，且英兵既已事前准备坚固之工事，而法兵甘为虎伥，开炮协助，余乃严禁各连还枪，官兵亦皆遵命”。黄埔军校入伍学生队第2营朱营长在惨案发生后第二日呈交的报告中称，巡行时军人最先中弹，死伤也是最严重的，“我们前为巡行之各界，后为友军部队，左为大河，右为商户，不能散走，盖恐危及我各界及友军，我们在此四面包围中，即下令倒卧。沙面各洋行二三楼之机关枪亦向我军人射来。沙面之兵器甚为厉害，若中身上，均即炸开，我们受弹后均不能生”。黄埔1期生蒋先云（时任党军第1师第2团第2营代营长）观察到，英法士兵“反闻我发口令之处，或我穿黄军衣之军官有移动时，则更加重火力”。第1团第3营营长曹石泉，是沙基惨案牺牲的黄埔军校师生中职务最高的。



/ 曹石泉。

英军看其服装为官长，竟然用机关枪对准其猛烈射击，曹石泉腰腹等部位连中数弹，血流如注，未等送入医院即牺牲。第2排排长义明道、陈纲因禁止士兵开枪，有所移动，即为沙面机关枪扫射当场死亡。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第3营唐家宝亲眼目睹同学丁炳文喉管被机关枪子弹打断，华学端膝盖被打穿，刘伯龙被子弹从前胸穿透后胸。黄埔3期生宋瑞珂在多年后仍清晰记得当时身边同学“孙嘉傅重伤，两胯股被敌人达姆弹打掉肌肉如碗口大，蒋铁生身中十枪……”，惨烈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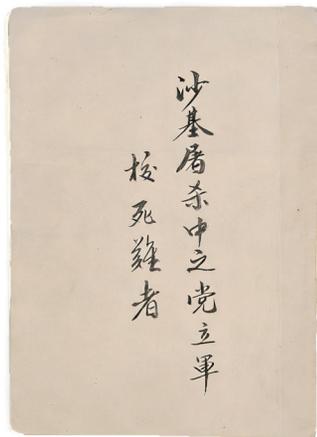
然而即便是处于这般极端危险的环境下，黄埔军校师生仍坚持不离开沙基。为免“使帝国主义匿笑，遗我党军羞”，



/ 沙基惨案死难的黄埔学生钟煜光。



/ 沙基惨案死难的黄埔学生郑逢良。



/ 《沙基屠杀中之党立军校死难者》。



/ 沙基惨案死难的黄埔学生冯荣德。



/ 沙基惨案死难的黄埔学生刘著录。

者并列出了其职务、姓名、籍贯等信息，是目前所见的史料中信息最为齐全的。其中，徐仁江、尹觉世、钟煜光、赵懿铨、郑逢良、冯荣德、丁炳文、刘著录、朱祖荣、郭光彩、夏植、陈晋等 12 人为黄埔军校第 3 期入伍生；文起代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队第 7 连排长，军校官佐；曹石泉、陈刚（纲）、义明道、卢鸿昌、章致堂、张玉容、胡典成、张德成、王正廷、徐福荣、徐志远等 11 人为党军第 1 师官兵；另有傅林燁、官权山、熊芳雷等 3 人未标注职位信息，但列在调查表中，想来也是黄埔军校或党军内的人员。《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最终列表公布的沙基惨案死亡人数为 52 人，两个数字相比，

他们一直坚守现场，进行警戒，严密监视英兵动向并疏散民众，以防有意外情况发生，直至何应钦下令率队归营，“认此时党军之责任已尽，方收队循沙基

口、长堤、永汉路、惠爱东路而归北较场营所”。

1925 年黄埔军校编写了《沙基惨杀案中党立军校死难者调查表》，统计共有 27 名牺牲

仅黄埔军校及党军的牺牲人数就达总数的一半。

黄埔军校师生对沙基惨案的反映及相关纪念活动

惨案发生后，广州国民政府当即向沙面外方发出照会抗议暴行。广州各界群众更为激愤，“五卅惨案犹未结，不幸五羊更遭惨劫。如此沉冤何处诉”，掀起了新一波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浪潮。6月23日晚7时，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即呼吁各团体在惠州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到会团体有120多个，约300人，由事件亲历者报告当日沙面的惨状，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会后，组织陆军军官学校、湘军讲武堂、全国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联合赴广东省公署请愿，提出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

为反驳英法方面提出的参加游行的军人、黄埔学生先行开枪的无赖言论，6月24日，广州国民政府召开工农商学兵各界会议，推举代表成立“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调查惨案始末，收集惨案亲历者的报告，记录惨案细节、受伤和死难者信息，编制《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作为与英法帝国主义交涉的凭据。参与游行

示威并亲历惨案的何应钦、蒋先云等都撰写了翔实的书面报告，以第一人称视角，还原了惨案现场的情况。蒋先云在报告中自称为“二十三日沙基惨杀后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口的一个，同时亦是被他机关枪正面射击万幸而不死的一个”。

亲历沙基惨案，令身负救国救民职志的黄埔军校师生更为愤慨，正如周恩来所说：“黄埔健儿之血既染遍了沙基，英国帝国主义者遂深深认识了党军党校的最大使命，是在与他们誓不两立。”6月24日上午8时，黄埔军校全体官佐学生开会，讨论应对沙基惨案。当天，黄埔军校发布《檄全国军人》布告，通告沙基惨案经过情形，誓言“此后若有一兵一械，誓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

7月1日，黄埔军校第3期举行开学典礼，周恩来发表了抗议帝国主义制造沙基惨案、屠杀中国人民罪行的演说。他号召学员们要严守纪律，“努力研究主义”，争取“达到学业成功，而实行革命”，并“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他指出：“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时，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沙基惨案。”当天，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党代表廖仲恺率黄埔军校全体官生士兵发出通电，报告在“六二三”惨案中黄埔军校损失情况，“我军校学生士兵死难者二十三，受伤者五十三。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死亡之多，有过沪汉。似此情形显系帝国主义者蓄意谋杀，中正等目击惨案愤激无极”，并就此次惨案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沙面、禁止外舰入内河、全国各军同心协力对抗英国、联络友邦及各国被压迫阶级以壮大声势、政府妥善安置并编练罢工工人等意见。

8月4日，黄埔军校全体官佐、学生党军官长及士兵代表在大操场开追悼沙基死难烈士、东征广州各役阵亡将士大会。当日的追悼大会十分庄重。“会场正南大门、正北面搭祭台一座，内悬众烈士遗像及誓词、总理遗嘱、挽联等物，台中竖沙基死难烈士、东征战役死难烈士、刘杨之役死难烈士诸灵位，围以黑白纱及鲜花，香烟缭绕，花圈布满阶下。会场两边遍挂挽联及哀词。”下午1时半开祭，参加人员除黄埔军校师生、党军外，还有番禺第二区农民协会数百人及飞鹰舰舰员。追悼大会由何应钦唱礼，蒋介石任大会主祭，宣读总理

遗嘱，行礼，领诵誓词，默哀3分钟，继由周恩来宣读祭文。蒋介石作《追悼沙基死难同志的重大意义》讲演。全校师生悲愤满腔。

在沙基惨案中，黄埔军校蒙受损失，但也大大坚定了师生官佐争取国家权利、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意志，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在惨案发生的当年即编印了《沙基屠杀中之党立军校死难者》一书，内容包括惨案中黄埔军校死难学生照片、各界吊文、死难者名录、部分死难学生传略、亲历者的报告和回忆等，保存了黄埔军校师生亲历沙基惨案的珍贵史料。黄埔军校血花剧社编排了《沙基血》剧目，通过戏剧还原惨案场景，该剧于1925年6月底在海珠戏院公演，揭露帝国主义屠杀罪行并筹款慰问受害者。这种沉浸式教育使政治理念深入人心，观众反响热烈，据学员回忆：“演完工人中弹倒下的桥段，全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声震操场。”

此后，黄埔军校师生更深入持续地对省港罢工进行支持，在军校全体党员《函答省港罢工工友书》中坚定表示，“省港罢工，是英帝国主义者认识我



/ 1926年6月广州市政府立的沙基惨案纪念碑。

们民族精神的第一次”，“愿竭我们能力予以相当的物质和精神援助，并且矢志为工友们武装的后盾”。1925年9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组建纠察队，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教练。此后，黄埔军校1期生伍文生、蔡林蒸，2期生邢定汉、谢卫汉、韩铿、张思廉、刺刚、詹行旭等多人曾在纠察队从事教练和指挥工作。黄埔军校师生还曾配合罢工工人与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第5期入伍生邱行湘回忆，他所在的第1团除了担负东江防务之外，“还与省港罢工运动相配合，直接与英帝国主义面对面地作

斗争。有时英舰或英国商船不听要塞信号，我守军配合要塞用武力加以制止”。1926年8月25日，黄埔军校全体官佐师生在其操场举行拥护省港罢工大会。随后，黄埔军校印发了《拥护省港罢工专号》，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拥护省港罢工宣言》中坚定指出，“五卅、沙基惨案一日未解决，罢工损失一日未赔偿，则省港罢工一日不能停止。本党及本校之使命在扶助工农利益，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国民革命”，展现了黄埔师生将反帝斗争坚持到底的决心，充分贯彻了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六）

□ 熊子杰

第二十六章 中华民族英雄 冢：淡水万善堂

淡水万善堂位于淡水高尔夫球场北端，虽地处偏远鲜为人知，原仅为当地民间信仰的庙宇，但传说有求必应，十分灵验，近年来到此参拜之善男信女日渐增多，庙宇亦逐年扩大。

万善堂内安奉 130 年前近千具无主之战士遗骸，其中隐藏无数可悲可泣的感人故事。这些无主战士乃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乡亲，离乡背井，抛家弃子，渡海而来。他们的作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其英勇事迹与爱国精神名垂青史，不逊于任何忠烈祠内之英魂。他们就是在清末中法战争沪尾战役中为保卫台湾而捐躯之先烈。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中少数战胜列强的战役之一，也可谓台湾最值得骄傲的胜战。可以说，当时台湾之命运决定



/ 万善堂。

于中法之战，而整个中法战争胜负关键在于淡水之役。淡水战役中，法舰以船炮狂轰淡水阵地，想强行登陆，清军埋伏于岸边防风墙密林迎战，使法军受困于丛林。提督孙开华带领兵士虽处枪林弹雨之中，仍奋勇杀敌，与法军肉搏，终将法军击溃于丛林。此役中清军英勇的表现虽成就光荣的“沪尾大捷”，但士兵伤亡惨重。先

烈们为报效国家、保卫台湾，求仁得仁、壮烈就义，其精神值得两岸中国人景仰。

淡水之役血流成河，战死者上千人，陈尸遍野，惨不忍睹，一些遗骸暴露荒野无人照料，一些只是随地掩埋。可怜呀，这些为台湾捐躯的先烈们！更可悲的是 1939 年设于古战场内之忠烈祠，原本竟是日本人为祭拜日本明治天皇及军官兴

建的“淡水神社”。台湾多数人却不知祭拜这些为台湾牺牲的先烈们，这是多大的讽刺及侮辱。中法战争后，法国人在基隆为战死法军立碑建园，而台湾同胞对我们的忠勇烈士，则令其成为孤魂野鬼，真叫人感叹！两岸有志中国人应该共同向这些烈士致敬，为他们立碑建馆，让他们早日魂归故里。

昔日发生激战之丛林、土堤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商贾富人娱乐健身的高尔夫球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淡水之役已过去百余年。1971年，因淡水球场扩建，在球场北端小丘几处地方发现许多古墓，有的是数百具骸骨合葬一墓。这些古墓的墓碑多数刻有光绪年号及阵亡将士英名。经查，掩埋其中的乃淡水战役中为国捐躯之先烈遗骸，其籍贯大都为湖南。工程单位欲将这些无主遗骸就地掩埋或移往他处丢弃，当时球场副经理黄德利先生发善心抢救，禀报主管及当时的球场会长王永在先生（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弟弟）。黄德利认为，这些战士为台湾牺牲，是台湾人的恩人，建议妥善安置这些英灵后再动工扩建球场。王永在接受建议，最后决定在现址兴建一祠堂，安置这些烈



/ 黄德利（右）与本文作者合影（摄于2016年7月）。

士遗骸。最后由淡水高尔夫俱乐部、地方士绅善众共同集资，在球场旁兴建万善堂，并将所有战士资料列册后安奉遗骸及灵位于祠内，供后人参拜缅怀，同时以此勉励后辈效法先烈忠勇爱国、牺牲奉献之精神。黄德利并恳请球场杆弟谢富田先生负责打理照料万善堂，每日早晨开门、开灯、上香、点灯、诵经、祭拜、供养；晚上打扫、关灯、关门……日复一日，数十年从未间断。每年重大节日期间还要举办祭祀典礼，尤其在农历七月中元节举行大型法会，敦请法师启开安置烈士骸骨的铁门（正堂前方两侧寿字铁门），将烈士骨灰坛移出，诵

经超度，祈求菩萨保佑烈士英灵离苦得乐，回到故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今，谢富田已往生，现交由他两位女儿轮流打理万善堂。46年来两代人照顾这些先烈，不曾间断一日。

万善堂现被台湾人尊称万应公祠，如今香火鼎盛。庙宇正堂两侧奉祀地藏王菩萨和福德正神，更增圣威。今日台湾正处于魑魅魍魉鬼叫狼嚎时刻，更须弘扬烈士精神，使浩然正气长存山林，令爱国情操流芳万世。台湾作家李敖曾说：“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这里就是值得作家李敖下跪的地方，因为这里供奉的乃我中华民族英雄。🇺🇸